

中國青年軍人社出版叢書之五

和平協作的真偽
蕭青題

舊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目次

序言	
和平協作的真偽	胡漢民
胡先生發表與王亮儔孫哲生晤談經過	
胡先生對於和平協作及個人出處問題之談話	
胡先生爲甯粵合作對法報記者之談話	
論和平統一	鄒魯
蕭佛成先生關於獨裁與和平之談話	
胡先生入京主政的先決問題	李斌
西南不能與南京合作的根本原因	姜敏池
論和平合作	王葦
和平前途之瞻望	
誠感與情感	

矛盾之反宣傳·····	
所謂和平協作·····	
主張與條件·····	護黨
主張與代表·····	護黨
甯方何以又佈了這麼的烟幕·····	護黨
不可以風的讓德·····	護黨
等於零的言論自由之開放·····	護黨
爲甯粵和平協作告浙江青年·····	浙江健行社
甯粵和平協作之梗·····	仲康



序言

南京軍閥統治每一次遭受海內外同志熱烈的反對，國內民衆人怨鼎沸，頻於土崩瓦解，傾覆立至的時候，照例，總有一次和平運動的發生，高唱什麼「團結精神」，「共赴國難」的口頭禪，藉此以緩和反對者的情緒。然而每一次和平運動的消沈，南京統治也就更大胆無恥的出賣民族利益，與斷送國家的主權；同時，對於國內的民衆，以及一切反對他的非其同類者，其壓迫摧殘也就特別的殘酷與嚴厲。所以每一次和平運動的發生，正是指示出南京統治極度的動搖，慌亂；而和平運動的消沈，又是反映出南京統治暫時的鞏固與穩定。例如閩變勃發，南京政府在手慌脚亂，不知所措的萬分驚悸中，便有張繼等四人南下和胡先生商什麼和平合作，迨南京政府勾結日本帝國主義藉其助力擊潰十九路軍後，所謂和平也就隨着南京勝利的歡聲中而消逝了。又如去年底南京企圖召集五全大會以達到其廢黨造黨，且使軍閥獨裁政治得到黨的憑藉的時候，海內外各地的黨員，紛紛通電聲討，全國各民衆團體，亦羣起響應，南京統治懾於各地同志及全國民衆之威，知衆怒難犯，於是和平協作的聲浪，又從新自南京浮起；歡迎胡先生入京主政的呼聲，也喊得特別的響亮。及南京統治從容的更進一步投降日帝國主義，得其奧援以進行用武力統一全國的時候，所謂和平協作，又在「中日經濟提攜」，「深切諒解」的戀奸熱中忘却了。的確，這幾年來，所謂和平協作，已成爲南京統治緩兵之計的法寶，南京統治在這一虛偽的欺騙的口號

國家圖書館



001707494

下，是獲得了不少的便利。

正因為南京統治利用「和平」以鞏固其反動統治，所以它對於「和平」運動根本上便不會有誠意。結果，所謂和平，也就祇有空談，而永不會成爲事實。

其實，這並不足爲奇的，而是早已爲我們所預料及。因爲：

就和平本身說，寧粵之所以對立，不是什麼意見的隔閡，或感情的不洽，而是根本上對於黨國的認識不同。換句話說，粵方對於和平的要求，在於實現和平後能夠挽救目前黨國的危亡，而甯方對於和平始終則無誠意，即使寧方有所需求於和平，而其目的亦僅在於希望粵方能夠附和它叛黨賣國，共同爲奸！在這種彼此截然不同的要求下，怎樣能夠希望和平成功呢？去年冬，和平運動初起的時候，胡先生便堅決的提出這個問題：「故今日而尙協商所謂和平，講求所謂合作，則先決問題，即爲南京政府是否有澈底改革其錯誤政策之決心，與是否有接受我人主張之決心」。然而甯方顯然不能解決這個先決問題！即此，亦足測見甯方對於和平的真意了。

再就和平協作的運動而言：

第一，操縱，把持南京政府的軍閥蔣介石，他對於和平運動，根本便沒有誠意，只是以新舊軍閥的手腕，專門拉攏，敷衍一切的政敵，希冀藉此以鞏固其反動的政權。他更沒有決心從叛黨賣國的路上回頭，重新負荷三民主義革命的使命。

第二，正因為蔣介石沒有誠意實現和平，所以南京統治便不能徹底改正過去之一切錯誤政策，刷新政局，共挽危亡。對於粵方所提出之實現和平的一切方案，自然也置若罔聞

了。

第三，南京統治下之一切黨蠹，——改組派，政學系，安福系等，他們與和平運動根本便勢不兩立，因為這些黨蠹，他們是南京統治投靠日帝國主義的搨客，是屠殺民衆的劊子手，是吸吮人民膏血的妖精。而且他們誤解和平運動的意義，以為和平運動一旦成功，則胡先生須入京主政，將予彼等以大不利。他們於是恐慌萬狀，唯恐失寵於軍閥而犧牲其既得權勢，故急不暇擇的用各種手段來破壞和平。他們是絕不明白胡先生「對今日之中國」，除實現主義，挽救黨國之外，「實一無所求的」。但他們既認定和平運動真能實現，則首先被犧牲的便是他們這羣大小的黨蠹，因此，地們爲了要保護自身的利益，鞏固自己既得的權勢，於是便不得不盡力設法破壞這一和平運動。他們或出言不遜，有意造謠來中傷，誣蔑胡先生；或要挾，包圍軍閥頭目蔣介石，使其不敢與不能接受粵方的意見和主張，或直接挾日帝國主義之力以壓迫南京政府使其與粵方毅然決絕。總之，他們破壞甯粵的和平，恐唯力之不及，智之不周，而蔣介石深受他們的包圍，和苦於他們的脅迫，亦就祇有做他們的傀儡，供其玩弄了。

第四，奔走和平運動者，他們的認識，也是未免不足的。主要的錯誤，他們只對人，不對事。換句話說，他們唯一的努力，僅限於調和私人的意見，爲彼此拉攏情感，而不能認識和平運動之目的，是在於實現黨的主義，政綱，與政策等。故奔走數月之結果，亦是徒勞而無功。至於那些藉和平合作爲政爭工具之官僚，政客，其卑劣固不待言，而對和平運動所給予的破壞，自然也是不小的。

有了上述這些原因，則和平運動的前途，早已種下失敗的惡果了

然而轟傳半年來的所謂寧粵和平協作，給予國人以至全世界關心中國政治的人士的印象并非淺鮮的。但是和平協作的內幕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也許有許多人不了解。本社認爲這個問題是近年來黨內黨外重要問題之一，故特選擇幾十篇對於和平協作運動的重要文獻，另編成冊，題爲『和平協作的真偽』，俾世人閱讀後能夠了解這一次和平協作的真實現象，而不爲南京的宣傳所迷。

編者識

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和平協作的真偽

胡漢民

前年和去年兩年的十二月中，都照例來一套「和平運動」。前年十二月中來談商和平的，是溥泉，雄甫，陸一，星樵諸人，去年十二月中來的，有亮儔哲生兩人。每次「和平運動」之後，我都發表文字，紀述「談商和平」的經過。去年一月在本刊發表「政治上之責任問題」一文，就是表示我的和平主張的。時序催人，一年又匆匆過去了，這次的談商情形我也已經發表過。那就是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與王亮儔孫哲生晤談經過。」

那篇文章除用中文發表外，並以英法文公布。因為中外人士，很多關心這個問題的。自十二月二日起，海內外同志朋友，即不斷的有函電來探問，歸納他們的意見，大致如下：

- 第一 希望「和平協作」能成功，使中國統一，共赴國難。
- 第二 反對「和平協作」，認為軍權統治一日未推翻，則「和平」為不可能。
- 第三 以為和平也好，不和平也好，但中國總該求一條出路。現在所問的，是和平或不和平的辦法。

做成這次「和平運動」的核心的，似乎就是我的北上問題。懸想著所謂和平的，不斷的造我北上之謠，而勸我北上和反對我北上的，也紛紛不絕。我的答案很簡單，如在那篇文章中所表示的：

故今日而尙協商所謂和平，講求所謂合作，則先決問題，即爲南京政府是否有澈底改革其錯誤政策之決心，與是否有接受我人主張之決心。

余之出處行止，無人能支配之，惟無時不受主義與良心之監督，如可告慰於良心，無愧於主義，則余之北上南行，均無問題。

我自己是渴望和平的，然而「未同而言，無徵不信，不可不慎」，所以要求南京政府有些最低限度的事實答案，表示和平協作的實際誠意。我舉出治標三項，第一：須即開放人民言論集會出版之自由；第二：須確定入川剿共，對西南各省，并不作大兵壓境之威脅；第三：對於此間之朋友同志，不得敵視暗殺，而猖獗殺人之組織，須即解散。這些，無一不是當前的共同要求，更無一不是飾新內政的起始步驟。

(甲)不能做到第一項，不啻與國民爲敵，與國民爲敵的，自不能與我爲友，更何談和平協作？

(乙)協商和平而不撤兵，是決不足以表示誠意的。大兵壓境，撫劍而視，這是作戰的準備，不是和平的協商。假使如此來談和平，也許想我來一個「城下之盟」嗎？至於入川剿共之必要，我在「縱共政策及其危機」一文中，已經詳說了。

(丙)據王孫兩先生說：南京政府當局對於我的主張，是一定尊重接受的。但我的朋友同志，同情我的主張的，又何以天天在危疑震憾中？我是主張者，我的朋友同志是同情者，同情者且隨時有不測之禍，何況於主張者？更何有於所謂誠意？再者當局標榜「立憲」和「民主政治」，而人民生命，却絕無保障，殺人組織，又到

處而是，在殘酷的暴力統制下，是夠不上談所謂和平的。

我說：

余生平不逆詐，不億不信，當此國家多難之秋，惟望當局有澈底改革之實際，成功不必自我，除主義政策之外，余復何所爭持？

我提出那些主張，只是想趁南京有人來講和平協作的機會，爲中國國民請命，解除些慘酷的羈勒！我更想爲西南各省人民請命，解除大兵壓境的威脅！我更希望變更了目前的軍權統治，使改易爲三民主義之治，逐漸實現總理對於中國建設的具體主張。我以爲政府當局能先與國民同志講和平協作，則與我商量的和平協作，自然也包括在內，除此之外，我並沒有更大的要求！

有些人力持我當北上之說，曾親告訴我：

孫先生曾兩次北上，袁世凱做大總統，孫先生北上了，段琪瑞當執政，孫先生也曾北上過。現在有人請胡先生北上，胡先生也應該去。

在這些談話之中，頗包含了所謂「互相諒解」和「大度包容」等等的「北上論」。我的答覆如下：

袁世凱做大總統，是孫先生所讓與，孫先生當時是宣言不問政治的，他願以全力做經濟建設事業。袁世凱態度尙好，背叛民國的事實，并未彰著，北上自然不成問題。然而事後，孫先生未嘗不後悔。段琪瑞做執政是答應了孫先生「以國民會議解決國是」之主張的，在那次的政局轉變過程中，且有我們的同志在內，其情形自有不

同。然而當段琪瑞食言而肥時，孫先生的態度又如何呢？二年以前，也有人以同樣的話勸我北上，我說：「我對於此點祇有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我今日的態度，仍然如此。

北上南下，不是「相互諒解」和「大度包容」的問題，而是主義政策將如何去實行的問題。我不說過嗎？「余與汪蔣諸先生之私人感情，至今並無變動，今日所爭持者，為國家民族存亡問題，與主義政策之實行問題，決不能徒以感情兩字，掩蓋一切也。……且如見面而祇為感情，不談主義，不講政治，則余以為更無須乎此，黨事國事，已危如累卵，朋友念舊，握手言歡，蓋非為今日迫切重要之問題矣！」假如真有悔誤的決心，何妨就我所說的做出來看看，假如我所說的，並不是南京當局不應該做的，則我的主張和態度不該說有錯誤。

一般的錯誤，是因私而忘公，和知有手段而不知有主義。我確信敷衍拉攏的和平，決計不是中國國民所蘄望的和平，而這種和平，也決計不是真實可靠的和平。民國二十年後，有許多人北上過，題目都很好，諸如「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類，然而事實呢？在「團結赴難」的要求之下，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等等的口號去實現和平，或在「軍權至上」的統治形勢之下，以「立憲救國」等等的辦法來促成統一，口號如彼，事實如此，結果便不能免於「和平分贓統一賣國」的譏刺語！國家民族前途，也益發不堪聞問。民國二十二年三月，我在「什麼是我們的生路」一文中，就說過這樣的話：

九一八事變以後，一句最動人的口號，叫做「精神團結」「共赴國難」，孫哲生先生

以此口號而上台，汪精衛先生也以此口號而上台，可是在同一時間，同一口號之下，有時也會拂然而行，置「精誠團結」於度外，這樣看來，在上台下台之間，可以見出團結既未見精誠，國難尤未見共赴，結果，只利用一個漂亮動人的口號，做了爲「窮乏者德我而爲之」的工具。所以對日之不抗戰如故，日本對我之侵略也如故，在「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口號之下，這幾乎二年以來的變遷，除南京城中加多一批一批的新貴，東北人民加緊其一層一層亡省的慘痛外，究竟有甚麼裨補於國難呢？

所以我們決不需要「和平」「團結」的空洞名辭，却需要「和平」「團結」的真正事實。至少，目前的事實，——南京政府，絕未變更其錯誤政策，還談不到所謂和平和團結。若干人告訴我：「南京這次和平運動，是具有極大的誠意的」，我說：「有誠意自然好，有事實更其好」。「意」不容易看出來，「事」便可以昭示天下了。古人說：「誠於中者形於外」，與天下人公之，不更表示南京當局的光明磊落嗎？

去年十二月八日，孫哲生先生北行時，問我有甚麼具體主張，我除了覆幾封信托他帶去之外，還提出一個問題，請南京當局決定。問題是：

須先確定今後之政治基礎爲軍權統治，抑爲民權政治？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和平便有了途徑，協作也有了頭緒。但在南京當局看來，這個問題是不很容易解決的，當局在感電中說：

蓋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意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也。
軍事當局答日本記者之問，也說

中國與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國情不同，故無獨裁之必要。

但實際決不會如此，儘管口中說着：「中國無產生意俄政制的必要與可能」，而努力造成這種政制，始終是發言者唯一的要求。實際支配南京政治者，實際操着對人民和官吏的生殺予奪之權者，實際可以變更法律或變更政制者，甚至實際可以任意調動軍隊或以國家之領土主權予人者，是不是握有軍事權力的軍事當局呢？軍事當局所依持而會有這種權力的，是不是靠著蓄養如私產的數十萬軍隊呢？依於此種軍隊而來的權力，到底是軍權統治呢？或民權民治呢？假如承認實行 總理的民權政治為必要，則目前的軍權統治，正必須打破，而打破此種統治，又決不在空言欺飾！

有些人向來提倡民主政治，但目前的現狀，決不配說是民主政治，於是一方面說明中國之萬不能效法意俄德政制，一方面又無以自解於現實，便對中國之民主主義，作這樣的解說：

此種主義，當然永存，實為我人政治生活中萬劫不磨之主義。吾人之組織，或因經驗之進展，有所改革，吾人對於政治形式之主觀上，決不採用武斷或固執之態度。政府之機構不論如何改變，必仍為中國人民保持自治之神聖與幸福。

一般人必總疑心中國的現實政治是獨裁，便懷疑現時施行的，是否將為新凱撒主義之模範？自號為民主政治者，對於這些疑問，又不能不這樣解釋下去：

一國人民之所視為獨裁制者，在直接有關之人民視之，或不作同等觀念，一國人民所期望於其政府，他國人民，未必相同。所關重要者，惟在政府真能為人民服務耳。此

即民主民治之意義。

唉！民治的意義原來如此！獨裁的新凱撒主義，也許正是民治主義的神髓，則何以意俄民制又無須產生於中國呢？我們要記得馬克斯的兩句漂亮話：

以無產階級專政，爲德模克拉西而戰。

也許新的民主政治論者，又承認說這句話的馬克思，一定是民主政治的擁護者了。因爲他說的更具體：「要爲德模克拉西而戰」。

凡此種種，都證明中國現勢是軍權統治，不是民權政治，更證明過去的民主政治標榜者，爲了強要以軍權統治爲民主政治，便曲解民主主義成爲「玄之又玄」的「衆妙之門」。使民主政治，成爲一切政治制度的掩護者，無論是意德的法西斯蒂，或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甚至英美的政治形態，和中國的軍權統治，都可以把民主政治來概括著。因爲他說：「一國人民所視爲獨裁制者，在直接有關之人民視之，或不作同等觀念」，但他所認爲「最關重要」的，「在政府真能爲人民而服務」，將如何去提供事實呢？就如我所提出和平協作的治標三項，是不是「真能爲人民服務」的政府所應該做的呢？

軍政當局者，不肯對國民承認錯誤，不肯開誠布公的懺悔既往，却天天以詭辯的方式，掩飾其一切本難告人的惡劣措施。我們對於這樣的當局，該有何種觀感呢？明明是對日投降，又明明是絕不應付國難，但卻公告人說：

我人在被侵略之下，惟有盡其力所可能及，以從事於抵抗，有一口氣在，即抵抗一分鐘，使我國而再被攻擊，再被侵略，則我人亦唯有益加努力從事於抵抗。吾人之所以

力持忍耐，求籲公道者，蓋冀侵略者或能覺悟，採取較為合理之態度耳。

他以為這種應付，決不能認為矇昧軟弱，他說：「政府之所以採取此種行動者，無非顧及所有一切情勢，為國家謀利益計耳。」這些人，不自省責，卻更進一步，以一切形成現狀的罪責歸之國民，於是不自慚地說：

我人欲國民記憶以前之光榮，且切勿忘卻中國之命運，已投入一實驗之現代世界中，祇有勇敢，文明，團結，進取之國民，方能維持其自然的命運，欲求精神上之健全，團結，與愉快，國人必須信任政府之高尙意志及其忠實能力。

看了這些議論，當然更莫名其妙！「自然的命運」在這個有「高尙意志和忠實能力」的政府之下，恐怕難以維持！為甚麼，為的國家領土，在逐步短蹙，人民生計已日益困窮！身體上的壓迫，日重一日，精神上的健全，愉快，也已經不敢再想望了。

次之，明明是箝制人民的一切自由，限制人民的一切活動，但又很會說：人民及社會團體間，依法享有言論結社之自由。

又加以說明道：

蓋以黨治國，因為我人不易之主張，然其道，當在以主義為準繩，納全國國民於整個國策之下，為救國建國而努力，決不願徒襲一黨專政之虛名，強為形式上之整齊劃一，而限制國民思想之發展，致反失訓政保養之精神。

「以主義為準繩」，但所謂主義者，已不知其何所指？納全國國民於整個國策之下，而整個國策者，又不知是誰的意志所造成？直到現在政府以各種抗日團體為反動，壓迫摧

殘，無所不至，則降日該是當局的整個國策之一部份？又如政府嚴厲禁止一切批評時事的刊物，則摧殘言論自由，又該是當局的整個國策之一部份？諸如此類，都有些不可解！

我渴望和平，但實現和平，必須先排除虛偽。我所以先要求事實的答案，原因在此。一切詭辯式的政治論只有愈陷自身於無恥，愈陷國家於絕地，同時，政治改革的希望，也一定會越加減少。事實是不能抹煞的，人民是不能長被欺騙的，和平協作是不能徼倖成功的。政司需要改革是事實，當局需要省責是事實，而數年來對內對外之一切欺騙也是事實。我們要以事實來應付事實，決不能以空言來掩蓋事實。

想和平協作嗎？這便是我對於和平協作的根本意見。我發表這些意見并不和任何個人商量「和平協作」，我只是根據黨的主義和政策，與國家民族的實際需要，想勉力糾正些現行的錯誤措施。現在不是某人與某人間合作的問題，假定有所謂某人與某人的合作，僅是合作而不以黨的主義政策為基礎，祇是講感情，談拉攏，則過去兩三年間所謂合作，該都是我們的教訓了。我這樣說明，希望大家注意這一點，明瞭甚麼是所謂和平協作的基點，和所以不能和平協作的理由。同時更明瞭甚麼是我的堅確的立場。

胡先生發表與王亮儔孫哲生晤談經過

（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最近因王亮儔孫哲生兩先生，奉南京中央常委之託，南來邀余北上，外間於余態度，頗極關心。自本月二日起，美洲歐洲及南洋方面同志，即紛電詢問真相，近日收到函件，又大半探詢余對於所謂合作之意見及最近對於黨務國事之主張，余因不能分別答覆，爰發表此文，略記此次與王孫兩先生晤談經過，藉諗海內外同志之關心余行止者。王孫兩先生之南來，攜有中央常委蔣介石汪精衛居覺生葉楚傖于右任陳果夫等六先生之聯名函，語甚簡單，祇謂共商大計等語而已。此外蔣介石先生，亦別附一函，表示「違教已久，請北上」一行，藉罄積愆之意。似王孫兩先生此行，確負有和平之使命，當王孫兩先生與余晤談時，又補充說了許多感情的話，并力言蔣先生之如何誠意。余謂余歷來亦甚重感情，以過去之關係言，余與京中多數同志，共生死，同患難，均為不可得之朋友。惟人之感情，必須受理性之支配，如徒重感情，喪失理性，不啻自滅良知，此種感情，實不值我人重視。余與汪蔣先生之私人感情，至今并無變動，今日所爭持者，為國家民族之存亡問題，與主義政策之實行問題，決不能徒以情感兩字掩蓋一切也。故今日而尚協商所謂和平，講求所謂合作，則先決問題，即為南京政府是否有澈底改革其錯誤政策之決心，與是否有接受我人主張之決心，此兩者必須先有事實證明，庶幾余有以安慰其良心，而鼓動其興會。故在根本上，則當接受齊有兩電及民國二十年和平會議所議定關於和平統一之成案，實踐前言。其關於治標者，則凡三事：

其一 須即開放人民言論集會出版之自由。

其二 須確定入川剿共，對西南各省，并不作大兵壓境之威脅。

其三 對於此間之朋友同志，不得敵視暗殺，而猖獗之殺人之組織，須即解散。

此三者，非爲余個人之要求，實爲余代國人所請命，尤非爲余一人之私言，而實爲人之所欲言，當局果有改革誠意，則實行此三者，更不須若何預備布置，而所謂和平協作者，即已有事實之證明矣。

孟子有云：四十不動心，謂不爲利誘，不爲威迫也。余今年五十餘歲，爲革命奮鬥，亦已三十餘年，對今日之中國，實一無所求，遑論南京西南及中國之任何一地方，則利誘爲不必，積三十餘年之經驗，確信軍閥之武力，決不能不倒革命之主義，故任何人對余，應已無所用其威迫，即威迫，亦屬徒見其拙陋。余於治標之三項中，所以尙言及第二第三兩點者，以蔣先生既言和平，并不肯自承爲軍權統治與組織法西斯蒂，則倘猶欲挑起內戰，四出殺人，益促民族之淪亡，我雖甚不愛國民，甚不愛西南，甚至甚不顧朋友同志，亦決不能默爾而息。且余如一切不問，貿然北行，余之朋友同志，縱不我詰責，我亦無以自答其良心，并自對此數年來發表之言論主張，使朋友同志有來詰問者，謂「我輩隨先生，同情先生，徒以先生爲有主義與能敵屣一切權利，爲革命奮鬥之人耳。今若此，先生從此或即無災無害，而我輩尙日處危境，坐待宰割，即不然，則我輩亦不能如此反覆，使愧對我輩之良心與主義。先生將何以教我？余不能如其他人等有甚多政治之手腕，以自掩其行爲，爲求達到目的，即可不擇手段而行事者，此余於和平合作之事，所以不能不要求事實上之答案也。余秉性直率，對任何事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凡言有不合，理有未當，事有錯謬者，余當面指責，任何人在所不避，故歡歡喜喜，敷數衍衍，實遠不如人。若

一切離題甚遠，留爲當面之談判，余必且直言無忌，而人亦將不能悅受，是欲速不達，求親反疏，非徒無益，而有害之，則又何如多得實際之答案，與先求政見之接近，以爲見面之基礎，乃始謀面之爲愈耶？且如見面而祇爲感情，不談主義，不講政治，則余以爲更無需乎此，黨事國事，已危如累卵，朋友念舊，握手言歡，蓋非爲今日迫切重要之問題矣。總之余之出處行止，無人能支配之，惟無時不受主義與良心之監督，如可告慰於良心，無愧於主義，則余之北上南行，均無問題。余生平不逆詐，不億不信，當此國家多難之秋，推望當局有澈底改革之實際，成功不必自我，除主義政策之外，余復何所爭持。然而未同而言，無徵不信，不可不慎，余之行事，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一心爲國，更無不可告人之隱，此皆可公之天下後世，無所愧怍者。以上所言，均爲余面告王孫兩先生，囑其轉達南京諸先生者，余併親覆中央常委及蔣介石先生各一書，大意謂『國家大計弟以爲總理已垂示甚周，故數年來，仍悉心體認而莫敢外，此次與亮哲兩兄所談者，亦惟此旨，即託其一一面達，其間亦非片楮所能盡也』云云。今後和平前途，是否有望，南京政府，是否將改絃易轍，痛自悔悟，胥視其實際改革之答案如何而定，如空空洞洞，但云和平合作，而對人民之非法如故，對西南之威脅如故，對內政外交之錯誤如故，甚至縱恣其非法組織之殺人如故，則非余之所敢知矣。

胡先生對於和平協作及個人出處問題之談話

(一月十二日)

(一)關於和平協作一問題，最近並無進展。余對內政外交之一切主張，迄未被南京當局所採納，故前途極爲黯淡。然余不忘和平，並不能忘國家民族之福利，故深望南京當局，仍能有改革之實際。

(二)外傳余將入京出洋，絕非事實。數月來，孫(科)汪(精衛)孔(祥熙)諸先生之談話，不謂余將北上，即謂余將出洋，不知何所根據。須知余之行止，無須他人代籌，而發言不顧實際，似亦足損及發言者之信譽，竊願其稍稍加意。

(三)余數年來，對於內政外交之一切批評，均爲誠意之糾正，所提供者，均爲堅確之事實，所依據者，又均爲本黨之主義政策，對南京措施，絕無絲毫誤會，當局嚴禁余之言論自由，而強以「激於意氣，遠於事實」相誣，殊屬可笑。余竊望當局能遵守黨綱，開放國民之言論自由，亦使國民閱余之言論文章，使知余所言者，爲意氣，抑確爲事實？

(四)余在國內外各地之同志朋友甚多，惟絕未爲所謂和平協作之事而派出代表協商，彼等之分散各地，實各爲其生活職業使然，至謂派人入京，尤屬無稽

(五)余對南京政府，除依據本黨之主義政策要求改革外，一切無所希求。對功名權力之事，視之尤甚平淡，當局者，動謂將以某席相讓，余實深以爲鄙，余意不能努力於破除軍權統治之現勢，惟權利名位是競，非革命者所應爾也。

胡先生爲甯粵合作對法報記者之談話

最近來自王寵惠博士南北奔走，與各方面接洽後，於是所謂寧粵合作，遍傳全國。北平法文政報在港記者寶森堂君特謁胡展堂先生，探詢究意。當承延見，談逾數刻，胡先生議論滔滔，難盡紀述，茲歸納其所談要點，約紀如下：

胡氏首先言及

寧粵合作問題：謂王博士過港時，雖曾數度晤商，惟王博士之來，純以個人資格，爲友好間之一種會談，初未代表任何方面爲實際之商討，故余對於王博士之北上南行，不以爲負有何種政治上之嚴重任務如外間揣測者。王博士在京在贛，聞亦曾與軍政當道數次會面，但對於黨務，政治，外交，軍事，諸端並無具體談論。當道諸人，僅于口頭上希望余等對彼所實行之政策予以諒解，忽略事實及國家之危機，而趨重私人之情感方面，以求私人間之諒解，此種態度，恰與余歷年對事不對人之主張相反，極爲余所不取。余以爲謀國而不以主義政策及國家民族之福利爲前提，但求私人間之諒解，進而求私人間之合作，此決非爲政者所應爾。且必爲有革命之信仰及政治上的人格者所羞于啓齒者。故今日之所謂合作與否，爲一事實問題，非敷衍，拉攏，講私交，廢公誼，所能達到也。使當局能力改其現在一切錯誤之政策，以救國救黨爲己任，則我之諒解與否，又有何碍？若仍本其數年來之政策，媚敵賣國，並組藍衣社等，排除異己，淆亂社會，厲行軍治，余將何以諒解之？又何從諒解之？我從來所主張者，爲對內政外交之澈底改革，非私人間之苟且合作。在去年十二月發表對「時局宣言」中之主張八項，及最近發出之「齊有兩電」，皆可窺見余之意向。今當局者對上述主張，絕無接納之意思與接納之事實，徒斷斷于希望私人間之諒

解，甯非乖謬？主張與情感，截然兩事，如爲感情而可犧牲主張，一切可以舍公談私，則天下之大，尙有所謂正義與是非乎？！

胡氏談至此，卽轉變其辭鋒，以及事實。先言九一八以來，南京政府一切喪權辱國之事實，次再談及南京政府之政治形態。謂：在

南京政府之上，尙有一南昌之太上政府，而蔣介石實爲太上政府之核心。彼以一軍事領袖，在行政上而可以擅自發號施令，並擅自召集各級文官訓話，又可以組織藍衣黨，企圖以法西斯主義代替三民主義。凡茲舉動，可以證明蔣氏心目中，已無中央政府與中國國民黨（甚至對國家之體制法紀，亦絕未知尊重。余爲中國國民黨黨員，爲三民主義之信仰者，對於此種反黨反主義之行爲，非澈底反對不可！假定法西斯主義固有可取，然此種主義，亦當以維護國權，挽救民生爲目的。但蔣介石則不然。彼之政策，僅在擁護其個人利益，並未以國家民族爲前提。譬如在經濟方面，農村破產，須切實救濟，然至今絕無辦法，祇見農村之民脂民膏集中上海，公債與投機事業，反日形發達。彼復利用此游資，濫發公債，將收入所得，大部用諸軍備，而此項軍備，又絕不用諸抵禦外國之侵略。且復以棉麥借款及單方面優惠日本之稅則，使中國之農工商業，更趨破產。在軍事方面，剿共數年，共勢愈大，本來江西共軍，初祇數千，今則愈剿愈多。卽如四川赤軍，初時亦不過二三千而已，今則已有十萬之衆。彼頻年剿共，均調動嫡系以外之軍隊，開赴前方，使與共軍作戰，消滅異己，使其個人嫡系之軍隊巍然猶存。存心如此，共軍因得坐大。現聞共軍擬集中四川，此計劃尙使實現，後患何堪設想？假使蔣氏以前卽能本真誠從事剿共，何至以五十

萬大軍，圍剿數年，絕無成功？

最近

蔣介石在漢口召集軍事會議，又到華北視察，調兵遣將，極形忙碌，微聞蔣對西南之軍事，正在極力進展，此種精神，苟能用之以對外或剿共，則誠有可取。惜蔣氏之目的絕不在此！彼絕不肯模效土耳其之凱末耳，惟效法中國昔日之袁世凱，蔣氏不能覺悟，則無論任何人與之合作，亦不過「助桀爲虐」而已。最近蔣氏在廬山對上海字林西報記者談話，「謂不主張以武力征服西南，但如有背叛中央者，仍當隨時以武力平定之，」云云。所謂中央者即蔣氏自己而已。彼作此言，可知其仍把持武力統一之政策，然中國國民黨之中央曾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命其北上抗日，收復失地，蔣氏何竟違抗之，惟對日投降是務？彼徒知對內炫耀其武力，而不能用於抗日剿共，誠屬可笑！余雖無一兵一卒，然余深信余之主張，決非蔣氏之武力所能打倒。自袁世凱以來，以武力反抗孫逸仙博士之主義及余等之革命行動者甚多，然我等在孫逸仙博士領導之下工作，從未有一日鬆懈，而自袁世凱以來之大小軍閥，今皆已失敗，從無一人得人民之同情者。可知不以國家之根本福利爲念，想憑其一時武力鞏固其政權者，皆愚人之尤！此種事實，在世界政治史上，亦不少前例，則蔣介石欲以軍權統治中國，余可斷言其必將失敗也。

胡氏最後語記者曰，余之最大希望，在蔣介石等能改革一切內政外交上之錯誤政策。能改革者即爲余之友；不能改革者即爲余之敵，友敵之分，皆以主義政策爲標準，合作非空言所能達到，故今後我人是否能合作，亦須視南京能否變更其政策爲斷也云云。

論和平統一

鄒魯

和平統一，近來似乎又是一個很時髦的口號了。上月杪蔣汪感電中劈頭就說：『今日救國之道，莫要於統一，而實現統一，端在乎和平』。汪精衛在五中全會所致的開會詞，也謂：『……最大注意在於求和平，求統一。』自然，民國二十餘年來，戰亂相尋，民無寧日，誰不喁喁望治，祈求和平統一的時代到來呢？統一而能由和平中求得之，誰也要馨香以祝其實現！

一個國家，需要統一，這不但應該，而且是必要。政府能夠不用武力而以和平方法求得國家之統一，更是可喜的事。但是所謂『和平統一』並不是無條件地均是好現象，甚至在某種場合，和平統一，且有大害於國家。例如袁世凱，段祺瑞，曹錕，與吳佩孚之北洋軍閥政府，即使他們能夠實現和平統一，然其結果，也決不會有利於國家和人民的。所以和平統一的前提，必需要政府能夠衛護民族國家的利權，為全國人民謀幸福，否則和平統一不但無益，反為有害。總理畢生的努力，在於革命成功後求得中國之和平統一，以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國家，然而總理從不會與當時的北洋軍閥講求妥協，反而在革命策源地的廣州建立西南的革命政府而與北洋軍閥政府相對峙。為什麼總理不放棄革命政府所在地的西南，而與北洋軍閥講求妥協，以謀和平統一之實現呢？這是很明白地，和平統一，必須建築在革命的基礎上，離開了革命立場而求和平統一，其結果亦不過等於強盜式的分贓與

軍閥瓜分地盤，合夥賣國而已。故和平統一的真正意義，必在於和平統一後能夠一致的爲民族爭平等，爲國家求獨立，與爲人民謀幸福。換句話說，即是和平統一後能夠努力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國家。只有如此，和平統一，才有意義，才爲我們所需求。

目前南京高唱的和平統一，是怎樣一回事呢？這點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蔣汪感電中說：『當此歷史上空前未有之國難，若非舉國一致精誠團結，避免武力爲解決內政之工具，消弭隔閡，促成全國真正之和平統一，實無以充實國力樹立安內攘外之根基。』汪精衛在五中全會開會詞中又加以補充：『而所以忍辱負重，以求和平統一，在於維持安定，而所以維持安定，在於求得進步，使國力日以充實，民力日以增益，以解救國難。』然而這些巧言飾詞，是極爲模糊而又不切實際的。而且事實上南京蔣汪等在口頭上雖高唱和平統一，然在行動上却又進行無一不與和平統一相反的工作。所謂『充實國力』，『增益民力』，『安內攘外』的『老話』，久已成爲欺騙人民的口頭禪，不值世人一笑了。

現在我們且從事實上檢討南京標榜的所謂和平統一，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代表南京所謂和平統一的文獻，自然是蔣汪感日的通電了。該通電中除首尾兩端說了一大段冠冕堂皇，不着邊際空洞詞句外，並在文中提出了下列五項具體方案：（一）關於法制，（二）關於用人，（三）關於地方行政及經濟設施，（四）關於中央與地方之財政，與（五）關於國防軍及地方兵警之區別，應確定標準。這些從表面上看起來，誠然無可非議，但我們一按實際情形，則又如吾人在『魚』電所云：『和平統一……重行不重言，在目前而言和平統一……尤不必多求方法，應即實行成案，蓋民國二十年上海之和平會議，甯粵鄭

重派出代表所決定之方案，卽和平統一之辦法，……年來國之不競，黨之分歧，豈有他哉，亦在乎未能實行此方案而已！」

和平統一，重行不重言。可惜南京軍閥不但不重行，而且所提出的方案，盡是欺騙全國民衆的把戲，所謂和平統一，不過是利用國人厭棄戰亂的心理，以達到其武力統一，削除異己勢力之煙幕彈，或和平統一後更能順利的賣國而已。我們現在用不着斷斷然與南京爭論這些方案的得失，主要地要拿事實來說明南京是在真正進行和平統一的工作，還是繼續實行其武力統一的迷夢？

第一，在政治方面，中央與地方的政權，南京並不能遵循 總理在建國大綱之規定：『中央與地方採均權制，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事無大小，也不問其是否有全國一致，或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一概由南京所謂中央政府去包攬，而南京中央政府，實際上又不過是秉承委員長個人意旨，發號傳令的播音機。故近年來各省政府（地方政權），尤其是南京政府直屬基本的各省，事實上已無中央與地方性質之分，簡直成爲委員長行營的直轄區域。其他非蔣嫡系之各省，所有一切地方行政，更無不受中央或委員長行營之蹂躪與束縛，務使其行政權力的範圍，縮到最小的限度。至於各省府實行合署辦公之規定，僅出自行營一紙手令，而各省則唯恐奉行之不迅，不力，所謂『關於法制，中央祇宜規定原則大綱，富於伸縮力，其實施辦法，及詳密條理，則由各省市自行釐定，以期因時因地因人各得其宜，而無削足適履之病，』簡直是自欺欺人之具文！

第二，在財政方面，這幾年南京中央的財政計劃，有一點極值得我們的重視：它一方面積極擴大中央財政的範圍以裕收入；另一方面却又盡力縮小地方財政，使各省陷於困難的絕境，不得不仰求中央的補助。南京中央實施這種財政政策，其作用不外乎：一方面充實中央的財力以爲發揮武力統一排除異己勢力之準備；另一方面則又爲削弱地方財政，使其不能擴充武力，以與中央相對抗。而且，中央藉名補充各省經費之不足，恰又是收買異己勢力來擁護中央的法寶。最爲各省所痛恨的便是南京政府藉口廢除苛捐雜稅，以博得國人之同情了。實則南京中央一方宣佈廢除各省地方收入的苛捐雜稅，另一方面却又盡力提高與增加各種中央所徵收的捐稅，（如海關進出口稅，各種統稅，鹽稅……等等）故人民所得之實惠，爲地方政府所給與者，而又爲中央政府所掠奪！至於各省所進行之經濟建設（如廣東廣西），南京更從各方面去阻撓與破壞，大有非經南京中央之手，則不能以言建設者然！

第三，在軍事方面，南京政府近年以來，藉口剿共，大施其擴充自己勢力，剪除異己軍隊之陰謀。而且它實施『以鄰爲壑』的剿共政策，更爲襲取各省地盤之妙計。祇看南京政府自剿共以來，一切異己軍隊被假手於共匪消滅之者達數十師以上，而嫡系部隊，則自十餘師而擴充到六七十師！南京軍隊在江西剿共數年，而其結果，僅迫使共匪西竄黔川。現在南京不但不調閩贛之師，跟蹤追擊，反而駐屯三四十師之衆，徘徊湘南及粵桂邊境！另則令賀國光率領東北亡國軍西入四川，控制川省，以逐漸分化四川的各剿赤部隊，待機而席捲全川的地盤！

從上述政治，財政，軍事之聲聲大端者看來，南京是否有誠意的謀和平統一，還是繼續不斷的進行其武力統一的迷夢呢？我想誰也明白：目前南京所進行的工作，無一不與和平統一背道而馳的罷。如此，而欲『中央與地方，澈底樹立互信共信之基礎，推誠扶掖，同循政治正軌……』（五中大會宣言）豈不是嚙人說夢話！

然而南京現在所高唱的和平統一，是另有目的，別具懷抱的。他們需求和平統一，不是站在黨的立場上，以求民族國家人民的福利，而是站在軍閥個人的利害關係上來倡導所謂和平統一！所以這種的和平統一，猶如魔鬼戴上了笑面具，背後是藏着利刀的一樣可怕。

爲什麼近來南京忽然高唱和平統一的調子呢？難道真如蔣汪感電所言：『若非舉國一致精誠團結，避免武力爲解決內政之工具，消弭隔閡，促成全國真正之和平統一，實無以充實國力，樹立安內攘外之根據』嗎？假如南京真正有誠意要求和平統一，則西南『魚』電中早已說得很明白，很透澈，而且再鄭重地申言：『願同志同胞共同督責，將二十年和平會議及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之和平統一，均權之具體方案，舉而實行，不特同人等一致主張即國家民族亦莫不感受其賜；否則，過去之和平統一，均權，經和平會議鄭重議決之成案，而不能實行者，今又別求所謂和平統一均權之辦法，非徒徒滋紛擾，抑又誰能置信？』但是南京心目中所高唱的和平統一，根本觀念，並不是如此！

我們知道，這幾年來，南京政府不能痛痛快快地公然叛黨賣國，其他原因雖多，然而憚於西南領導下的革命勢力之制裁，却是最重要的原因。有一個時期（現在仍然如此），

南京政府確已下了絕大的決心，要用武力來消滅西南的革命勢力，然而西南不能爲武力所懾服，始終站在黨國的立場，與一切反動勢力相抗爭，結果，南京卒不敢犯全國人民之怒，進攻西南，掀起內戰。現在南京明知用武力來對付西南是不能使西南屈服了，乃不得不變更政策，來高唱所謂和平統一，希冀誘導西南一同參加南京叛黨賣國的行動。而且南京既倡導和平合作，苟西南不與南京同流合污，却可以嫁西南以破壞和平統一之罪名，實行以武力討伐！南京軍閥用心之險惡與毒辣，誠可謂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豈奈不知正義所在，西南決不屈服何！

很明顯地，南京所倡導的和平統一，其作用在於強使全國各省，特別是始終站在三民主義立場的不爲淫威所屈的西南，來贊同他們過去以至現在一切叛黨賣國爲禍人民的政策，在和平統一，全國一致的名義下，更能順利的進行其喪權辱國，出賣民族利益的勾當；同時在和平統一的假面具下，又可實現其削弱地方政權，擴大中央政權，以加強軍事獨裁政權之基礎。這便是南京高唱和平的真正目的。一切由南京所宣佈出來的和平統一的鬼話，均是企圖遮飾這種陰謀的煙幕彈，我們是不應受其愚的。

和平統一，不僅是我們的願望，而且是全國人民在目前迫切的要求。但是我們所需求的和平統一，是在統一以後能夠舉國一致的爲民族國家而奮鬥，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並不是在統一以後，『有整個計劃』，『政府自有辦法』去賣國！所以我們要求和平統一，是革命政府建立後的和平統一，而不是軍閥政府統治下的和平統一。祇有革命政府建立後的和平統一，才能領導全國人民，來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國家，至於軍閥政府統治下的和

平統一，縱然能夠實現，也祇能『有整個計劃』全國一致的去喪權辱國，出賣民族利益！所以，目前我們要求真正和平統一之實現，只有起來推翻軍閥的統治，軍閥統治不徹底推翻，祇有革命的戰爭，決沒有有利於民族國家的和平統一之可言。總理畢生努力求和平統一，以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然而他從不會和北洋軍閥講求妥協，以獲得與軍閥分贓的和平統一，而祇有不斷的反抗北洋軍閥的革命戰爭！這個，不是給我們一個渴求和平統一者的絕好教訓麼？

蕭佛成先生關於獨裁與和平之談話

(前略)

(問)今日中國是否有獨裁？

(答)中國因有獨裁，始造成「九一八」及「一二八」之國恥，茲以事實證明之。查自古以來，從未見於極短之時間，失去如此廣大之土地。再以「安內攘外」之成績而論，徒擁全國之兵，而不抵抗，後又藉口「先剿共而後抗日」，但四年以來，共匪非獨未消滅，反而增加，在「九一八」之時間，共匪之力量甚微弱，而在此時，已失去三省，可見非共匪阻礙當局之抗日，日本由東三省進侵華北之時，南京如誠意抗日，原應將大軍調到華北，何以竟將軍隊調至華南？今南昌又宣傳江西之共匪已告肅清，實則江西共軍之數量增加糧食缺乏，不得不另謀出路。現查中央剿共軍，總計在七十五師以上，擁如此龐大的軍隊

，何以竟讓共軍竄至湖南廣西及貴州？江西既無共軍，何以福建現仍駐卅二師大軍？以福建一省之軍隊而言，已超過歐美任何一國之常備軍的數量，兵既若是其多，而消耗於武裝之款，當然不勝其數矣，以有用之金錢，盡費於大砲飛機之中，致農村破產，民不聊生，此不獨中國受苦，即世界各國，亦蒙不利，因各國靠中國購買貨物，中國購買力弱衰，彼亦感受極大影響也。因此一般忠實同志，頗希望當局改轍弦易，將「軍權治國」及「軍權干涉一切」之錯誤速行舍棄，另圖正軌。蓋中國陸軍數量較世界任何一國為多，既如上述，則軍費之供給其偌大可知，故一年之所收，不敷支出，更發內外公債，以為挖肉補瘡，如是，欲躋國家于富強，其可得乎？矧國家設兵，求其衛國禦侮，今我國則反是，我國軍隊對外力之侵略數省疆土，竟熟視無睹，不敢抵抗，又何貴乎有軍？現在一般人認定世界將發生大變化，一九三六年之危局縱能渡過，而一九三九年太平洋危機，究難逃避。如中國政治修明，國防堅固，或者太平洋之大戰發生，因太平洋問題，即中國問題，列強絕不願任何一國，獨佔中國，但中國之統治者，却願將中國一大部份利益拱手讓與某一國，此種情形，若延續下去，將來中國必為日俄所瓜分，因中國在政治上造成共黨同時來侵中國。民國二十年以前，毛澤東賀龍朱德等共匪，僅三、四千人，今竟增至十餘萬之多，且有最新式之武器，試問共軍之軍械來自何處？再談南京，在黨的方面，查本黨以三民主義為基礎，三民主義就是民族民權民生。（一）民族主義，當然主張民族獨立，今南京竟斷送東北四省三千餘萬同胞為日本作奴隸，是不是違反民族主義？（二）民權主義，是主張言論，出版，居住之自由，君為新聞記者，當然知道國人之言論出版自由被南京政府壓迫至何用

地，彼等是否遵守民權主義？（三）民生主義南京政府年來之苛捐雜稅，以至民不聊生，不甯唯是，更從而毒殺之，即「鴉片公賣」是也。鴉片可以公賣，非毒殺而何？總而言之，今日國民黨之主義，完全被統治者之藍衣社所摧殘，試看上海天津北平及最近之福建，藍衣社黨徒可以隨便捕人，隨便殺人，殺不到的，即以手槍炸彈來暗殺，用是西南同志始有齊有兩電之忠告，而促其一改以往之暴戾行爲。將來結果如何，余不敢武斷，關於此點，余希望國人及友邦人士，皆能明瞭余等之主張，對南京實無惡意。

（問）先生對甯粵和平合作有何意見？

（答）和平二字，在國際可以講得，在國內則講不通。至甯粵和平合作問題，若與南京合作將國家送予外人，合作將三民主義打倒，此種合作，決做不到。此次王寵惠孫科之來，所負之使命爲何，因彼等尙未到此，內容不悉，故不敢武斷，余料彼等之任務，總不出感電之範圍，該電主要之點爲軍權統一與財政統一，如獨裁者能誠意爲國，改變他的軍權超過一切的非非法行爲，那麼軍財統一，亦未嘗不可。在九一八以前，南京對於東北西北，並非不統一乃反因統一才把四省土地於無聲無聞之中斷送了。假如南京真爲國家爲民族之統一來合作，余個人當然首先贊同，苟爲個人之利益或獨裁之威權而合作，余當決予反對。

；問）先生對於西南兩機關之存廢問題，有何意見？

（答）西南所爭者，非西南兩機關之存廢問題，純爲齊有兩電之立場也。

胡先生入京主政的先決問題

李斌

邇來京滬各地歡迎胡先生入京主政的聲浪，甚囂塵上，同時有若干中委亦曾表示有胡先生決可北來之談話，如像胡先生入京主政與否，僅爲時間上的問題了。

遠在五全大會展期之前，王寵惠氏即啣南京政府的重要使命，南下謁胡先生，以求和平合作，精誠團結之實現，近於五中全會開幕之前，王寵惠氏復偕孫科氏再度南下，由港而粵，奔走斡旋，更求甯粵團結之早日成功。現在孫科氏已偕粵方中委數人入京參加五中全會，而王寵惠氏獨留港與胡先生繼續協商合作辦法，似乎現在局面已有一線的轉機。但究其實雖經王寵惠氏兩次南下苦口挽勸，而終于未得胡先生之首肯。

在軍閥政客操縱把持下的南京政局沒有改變以前，胡先生絕對不會冒然入京，主持政局，這種極顯明的道理。我們只要拿胡先生過去堅決奮鬥的歷史，和最近所發表的「齊」一有」兩電的救亡圖存的主張來對照一下，就會明白，固無待我們多代爲申言的。

軍權獨裁者蔣介石及其御用下的南京政府，數年以來，倒行逆施，對外不惜獻媚投降，繼續出賣我國的領土與權利，對內則箝制輿論，鎮壓革命勢力，不惜殘民以逞，以求維持他們血腥的統治，一切的措施，顯已違背了總理的遺教，污辱了本黨革命的光榮歷史，使本黨蒙有禍國害民的惡名，而且與胡先生救亡圖存一貫的革命主張，實背道而馳。在此時期，南京的軍權統治，與所謂「黨治精神」，實在是截然兩件事，南京軍權統治之得以延續與維持，無非是依賴帝國主義，繼續斷送國土，出賣國權，淪我國民族于萬劫不復的隸奴境遇，藉以自榮自肥，徇一二人權位之私。胡先生數年來的革命主張與對黨國所貢獻的救亡圖存的大計，絲毫未爲蔣介石及其御用下的南京政府所接受。此時而欲要求與胡先

生合作，歡迎胡先生入主中樞，試想，以堅苦卓絕，嚴守革命立場，數十年奮鬥如一日的胡先生，豈肯與一般賣國漢奸同流合污，而扶用他們爲惡作非嗎？

南京軍權統治倒行逆施，一味孤行其是，不少悛悔，而貿然仰望與胡先生「精誠團結」，根本上已無合作的誠意。但是南京政府明知胡先生此時不致入京，而過事鋪張，高唱「精誠團結」的論調，以及宣傳胡氏即可北來，種種的企圖，其作用不外以下數點：

(一) 蔣介石及其御用的南京政府出賣主權，割讓國土，對日本帝國主義完全投降，造成今日的破碎支離的局面下，仍在求謀國內統一，企圖以軍權獨裁的力量，統制全國。要求胡先生入京主政，與西南實力派協作，即可竊取全國和平統一的美名。

(二) 蔣介石及其豢養下的藍衣社黨羽們，現在正猛烈進行黨政軍合而爲一的狄克推多的運動，在黨的方面，企圖恢復總理制，在政府方面，希冀于五全大會時，通過憲法草案，產生大總統。要求胡先生合作，即在取得黨國元老胡先生的承認他篡奪大位，爲合法的產生，藉以遂行其僭竊權位的陰謀。

(三) 蔣介石軍權獨裁的法西斯統治下，民怨沸騰，只因懾于淫威，敢怒而不敢言，但人民反對賣國政府與顛覆反動統治的決心，正與日俱增。歡迎人民所一致擁護的革命領袖胡先生入京主政，即所以俯順輿情，緩和國內民衆的反對情緒。

(四) 自九一八以來，以蔣介石爲首的南京統治，其喪權辱國，斷送東北四省，訂立各種賣國條約，實貽我國民族數千年所未有遭遇過的恥辱。此種背叛黨國，違反總理遺教的惡行，在曆史上自有不可逃避的罪名。歡迎胡先生入京主政，即在企圖把種種喪權辱國的

非名，分担在胡先生的肩上。

(五)南北軍人聯合反蔣與武力討伐蔣介石的醞釀，非止一日。現在蔣介石武力挾持下所召集的五全大會，製造民意，以遂行僭竊權位的時期，各方反蔣的發動，更有一觸即發之勢。蔣介石爲分散南北軍人一致反蔣的目標，乃要求與胡先生合作，藉以牽制各方的反蔣運動的發動。

根據以上所指出的各點，我們可以瞭然於蔣介石及其御用下的南京政府，此次所以歡迎胡先生入京主政的動機，實具有維持軍權統治，遂行僭竊權位與欺騙民衆的陰謀。

不過素抱「與人爲善」的胡先生，此次並不拒絕與孫科王寵惠二氏之談判，猶希望蔣介石能有萬一的覺悟，此種苦心孤詣，實政治家應有的態度。在中國國民黨存亡絕續之秋，勇於負責的胡先生不忍見黨的光榮歷史爲蔣介石一手所斷送，於是委曲求全，雖以在野之身，猶復苦心焦慮，對於黨國大計，擘劃周詳，自九一八以來，胡先生目擊國難日亟，內政腐敗，惕然殷憂，不安枕席，舉凡一切救亡圖存的主張，無不向蔣介石及南京政府作一一的評擊與貢獻。蓋胡先生所爭的只在一貫的救亡圖存的有效主張，並不在私人權位之爭，也不是對人的問題，而是對事的問題。倘使蔣介石及南京當局能翻然覺悟，痛改前非，誠懇接受胡先生的一貫主張，坦然向國人負荆請罪，把他們所挾持操縱下的黨權，還諸本黨，把依恃武力箝制下的政權，還諸國民。那末胡先生亦未嘗不可入京主政，以共圖挽救黨國的危亡。

觀於本年九月八日胡先生所發出的「齊」電，及九月廿五日所發出的「有」電，所陳

各節，均關係當前救亡的大計，其一種貢獻黨國的苦心，真不啻垂涕而道。倘使軍權統治的南京當局，能誠心悔過，虛心接納胡先生對黨國的一切主張，一反從前的賣國殘民的行為，那末，勇于負責的胡先生，當可毅然負起政治重責，固不必待今日南京方面之卑辭厚禮，而重勞王孫二氏僕僕之征途也。

現在南京方面歡迎胡先生入京，是否具有誠意，即在其能否完全接受「齊」「有」兩電的主張爲斷。故胡先生此時肯否入京主政，其先決的條件，亦在「齊」「有」兩電能否爲南京方面完全採納爲依歸。

可是我們只要將蔣介石的南京統治的形態加以簡單的分析，同時更以過去和現在的事實來證明一下，現在要希望南京統治能夠立即放下屠刀，輕變其反動統治的路向，誠懇的來接受胡先生之「齊」「有」兩電的救亡圖存的主張，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一句，這是一種不可能的事實。因爲蔣介石的南京統治的反動性，決不是偶然的一回事，而是具有深長的歷史根源，和深厚的社會基礎，絕對不是一紙宣言電文所可冀其翻然覺悟，遽爾放棄其一貫所執行的反動任務。故在民國二十年上海和平會議，寧粵鄭重派出代表所決定的國是方案，從未見諸實行。又如「齊」電所提的議題，均爲目前挽救危亡的對症良藥，而南京軍權統治，不但絲毫不予採納，竟且置而不提，提而不議，必欲排除異己之主張，陷國家民族于萬劫不復而後已。在「齊」電發出未爲南京統治採納之後，苦心孤詣的胡先生爲求貫徹其爲「黨」爲「國」爲「人民」奮鬥之主張，復于有日電詢南京政府力爭言論之自由。無如南京軍權統治的箝制人民言論自由，較諸歷史上任何專制暴君都要暴戾，不但本黨黨

綱所規定的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權被剝奪，即本黨黨員應有的討論批評自由，亦被剝奪殆盡。胡先生在「齊」電中所提的救亡的根本大計，既被南京軍權統治束之高閣，而胡先生所要求言論自由的「有」電，詎于發出之後竟爾遭扣！可知在軍權統治下爭「自由」，與賣國求榮者謀「國是」，簡直是「與虎謀皮」！

同胞們！同志們！你們能相信蔣介石及其御用下的南京政府現在能誠懇的接受胡先生「齊」「有」兩電的主張嗎？倘其能夠接納胡先生的救國主張，而一反背叛黨國的行爲，又何至「齊」電發出之後，竟被束之高閣，而「有」電發出即至被扣呢？

當然，在南京軍權統治沒有完全接受救亡的根本大計以前，胡先生決無入京主政之可能。所以凡是忠于黨，忠于主義，忠于民族國家的革命戰士，千萬不要被南京統治口頭上的和平統一，和形式上歡欣胡先生北上的宣傳所迷惑，以致放鬆向軍權統治進攻的革命工作。我們必須更堅決的團結起來，站在胡先生的領導之下，誓爲實現「齊」「有」兩電的主張去鬥爭！向着唯一反軍權統治的革命道路去猛進！至於胡先生是否入京主政，我們倒要先問；南京是否能夠實行「齊」「有」兩電的主張？

西南不能與南京合作的根本原因

姜敏池

自九一八事變，東北被日帝國主義強盜掠奪以後，於是「精神團結，共赴國難」的口號，便成爲最時髦的口頭禪。南京政府且曲解這一口號，利用它來制裁國內一切反南

京政府降日賣國的運動，爲其自身辯護之法寶。而國人爲『精神團結，共赴國難』之口號所愚惑，亦絜然不察！例如去年冬間，閩變勃發，南京便背起這塊『精神團結，共赴國難』的招牌，派中委張繼等四人南下，向西南各中委調解，共來擁護南京的所謂中央。然而閩變救平，南京對於西南的一切主張，却又漠然忘却，故態依然了。又如此次南京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企圖利用大會來毀黨造黨，消滅西南的革命勢力，達到其軍事獨裁政府統一全國的目的。西南洞燭其奸，乃有齊電之發出，提供挽救危亡的重要議題四項，爲大會最低限度應有的決議，義正詞嚴，全國響應。南京才知道要利用大會達到其私人的陰謀，并不如預期的容易，於是表面上才又示意：對於西南的意見，還有商量的餘地，以便『由和平途徑謀合作。』

這一次和平使者，便是王寵惠博士。也許他這一次負起和平使者的任務，冀以溝通各方的意見，比較前次張繼等四人南下，專爲南京做說客，較爲純正。也就是說，王博士是爲良心所驅使，大半由於自動。據他本月二十一日自港到滬後發表之書面談話云，『余此次返國，原擬乘假期遊歷各地，以廣見聞，本不願過問政治。乃返國後，目睹我國現狀日趨危險，前途茫茫，誠有不堪設想者。竊不自量，聊盡匹夫之責，兼以友好勸，乃遍訪各同志，冀有溝通其意見，以求一共同救國之方法。據余個人觀察，各方僉主張由和平途徑謀結合，以紓國難，轉危爲安，此則稍慰衆望耳。余此次到港，先晤胡展堂先生，胡先生曾經表示：余比年來與他方主張雖有不同，但純爲對事，絕非對人。當局者果能勵精圖治，余固無閒言等語。……』從他這簡短的書面談話中，也足以看出他一片爲『和平途徑

謀合作』的熱忱，是如何值得國人的欽佩！

西南不能與南京合作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關於這點，王博士當能明白於心的，正如胡先生對王博士所言：『余比年來與他方主張雖有不同，但純爲對事，絕非對人。當局者果能勵精圖治，余固無閒言。』所以在閩變時胡先生即在其對時局宣言中重申其堅持不易的明確態度：『余追隨本黨總理孫先生致力革命數十年，深信本黨主義實爲拯救中國之唯一的主義，故余之立場，必絕對遵依此革命之主義。余又爲中華民族之一員，深信中華民族，必能屹立於世界，擔負其如總理孫先生所示偉大之使命。故余之行動，又必絕對不背乎中華民族之立場。申言之，凡違背本黨之主義，喪失民族立場者，余必將竭盡所能，以反對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目前西南不能與南京合作的根本原因，便是南京政府已『違背本黨之主義，喪失民族之立場。』因此，西南不能與京苟同，共同合作，以背叛主義與出賣民族利益。反過來說，南京政府希望西南共同合作，以收『團結精神，共赴國難』之效，則首先非澈底更張南京政府之內政與外交，切實履行胡先生等『齊』電中所列之四項主張不可！『齊』電中不是明白的告訴南京政府：『上列四端，……同人等爲維護本黨，鞏衛國家，誓必堅持上述主張奮鬥不止，苟利於黨國，任何犧牲在所不辭』嗎？

遠在閩變南京向西南調解的時候，我們曾如此說過：西南與南京間的對立，這是不可諱言的事實。然而西南之與南京對立，並不是私人意氣之爭，更不是黨內的政見彼此各有不同，乃是根本上反對南京政府假借以黨治國的名義，實行叛黨賣國爲禍人民的事實。可惜南京政府叛黨賣國的行爲，一年來不特不能稍有斂跡，反隨時日久長而變本加厲。以

致西南與南京間的鴻溝，亦隨着南京倒行逆施而尤深且闊！現在王博士以滿腔的熱情，奔走呼號，企圖填塞西南與南京間這一深的鴻溝，後效如何，便是要看南京政府是否能夠接受『齊』電所提出的四項主張爲斷。因爲西南一再宣言：『國家危急至此，黨內問題，實無爭持之必要。當前急需，爲挽救危亡，求所以自贖而已』。然而齊電的四項主張，不僅是西南的意見，乃是代表本黨全體同志以及全國民衆對於挽救目前黨國危亡的最低限度應有的要求。倘若南京政府不能接受此項主張，則可證明它叛黨賣國的政策，決不會有絲毫變更。那末，西南爲求福利於黨國，任何犧牲，也在所不辭的。

現在我們要問西南與南京是否可以達到『由和平途徑謀合作』呢？據我們的觀察，前途絕未許樂觀！固然，在西南方面，站在黨國的立場，以民族利益與國家主權爲前提，是對事的，祇要有利於黨國，對人的問題，絕無成見。但，南京方面則恰恰相反，他們站在軍閥私人利益的立場上，與黨國的利益有如水火之不相容，要想他們放棄個人的權利之念，而忠誠於黨國，便無異與虎謀皮！

這一次王寵惠自告奮勇的負起和平使者的任務，也許是徒勞，因爲南京無誠意的接受西南挽救黨國危亡的根本大計，與履行『齊』電所提出的四項主張，乃是極顯明的事。試看蔣介石對西報記者發表之談話，言及西南諸事時，公然宣稱：『如中央有討伐命令，渠當絕對遵奉，掃平叛亂。』爲準備這一討伐，蔣介石乃有赴漢往西北，飛往北平的行動，從軍事上，政治上與外交上準備進攻西南的工作。這不但在言論上已顯露出所謂討伐西南之意，而且在事實上已積極佈置進攻西南的準備了。最使我們可笑的，南京指導下之所謂

輿論，竟抹殺事實，來污蔑胡先生的政治主張。請看二十四日申報載二十三日南京專電吧：『王寵惠四點到鐵部官舍晤汪院長，陳述南行晤及胡漢民陳濟棠李宗仁等經過。當時參加談話者，葉楚傖，居正，陳果夫，褚民誼各要人，談話約一小時。微聞胡展堂對政治意見，並無具體辦法提出。』這是什麼『狗屁』！誰人都知道：胡先生對於政治意見，從來就有其鮮明的一貫的主張，不像南京這一大批的黨棍，政客，官僚一樣，唯唯否否，仰承軍閥的鼻息，看他面上的顏色去說話！胡先生對政治意見，並無具體辦法嗎？除非南京這班黨棍，政客，官僚們被蔣介石軍閥的油水浸漬了心目，他們才閉着豬一樣的腫眼，看不見胡先生在閩變時對時局宣言的八大主張，以及最近的『齊』『有』兩個通電中所舉出的具體辦法！然而汪精衛二十三日以書面答記者畢竟較忠實些，他說：『王先生此行，於疏通情感方面，已有成效，惟辦法尚無具體的結論。』的確，西南在情感方面，對南京並無惡意，至於與南京合作辦法的具體結論，他們不得到蔣介石的聖旨，怎樣會有具體的結論呢？而今王寵惠先生是到北平去晤蔣介石了，王寵惠的一席話，是否能使蔣介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誰也是明白的吧？

總而言之，西南不能與南京合作的根本原因，完全是雙方的立場不同，西南不能放棄黨國的立場，苟同南京叛黨賣國，爲禍人民，猶如蔣介石不肯放棄私人權利的地位，以謀黨國的福利是一樣。雙方的立場不同，欲『由和平途徑謀合作』，是可能的麼？然而南京猶敷衍這所謂合作，正如蔣介石電令南京中央黨部延期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用意相同，其目的不過是緩兵之計。一俟他準備進攻西南的佈置妥當，他便扯破和平的假面具，

拿出槍砲和西南講說了。在這和平合作的聲浪中，希望西南當局注意蔣介石這一陰謀，勿再墮入其狡計呀！

論和平合作

王 葦

在國際間，我們常聽聞某一國與另一某國實行和平合作；在一個國家內我們亦常聽聞彼此不同的政黨實行休戰，共謀和平合作，以衛護國家的利益；然而我們從不曾聽聞過在一個革命的政黨內而有所謂『和平合作』；有之，便是目前寧粵間所謂『和平合作』吧？

一個革命的政黨，它有某種主義為其最高之理想目的，它有一定的政綱與政策為其達到此等最高理想目的之方法與手段。一個黨員，如果他違反了黨的主義，背悖了黨的政綱與政策，他便是叛徒，便是反革命，黨站在革命的立場，決不能寬恕此等反革命容許其在黨內而與他謀妥協，講求所謂和平合作。反之，全體黨員在黨領導之下，同一步驟，同一目標，一致的共同努力進行革命的工作，決不能謂為『和平合作』。所以一個革命的政黨，在內部決沒有什麼『和平合作』的，因為黨內同志間雖偶有政策上意見之不同，而主義與政綱固不能隨意曲解與背叛，而且黨內一切政策，既經大多數黨員之通過，即成爲黨的決議，少數人尤不能憑藉暴力，隨意變更。黨的意志與行動是整個的，黨員在最高機關領導下努力工作，怎樣會產生什麼『和平合作』的怪現象來呢？

中國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爲最高之理想目的，以總理一手訂定之政綱政策等爲達到此

最高理想目的之手段與方法。故凡屬黨員，必需奉行三民主義，努力促其實現；遵循總理之政綱與政策，努力促其實行。一切違反三民主義，背悖黨的政綱與政策之黨員，均是中國國民黨的叛徒，全體同志的姦賊。黨對於此等叛徒，同志對於此等姦賊，決不能寬恕其罪惡，容許其寄生黨內，和他交談什麼『和平合作』以求妥協！

目前，西南與南京間的對立，這是無可諱言的事。然而這種的對立，絕對不是對人的問題，更不是僅限於黨內政見上彼此各有不同，或意見上各有誤會的問題，根本上乃是護黨叛黨，與救國賣國的問題。因為西南會一再宣言：『同人等認爲國家危急至此，黨內問題，實無爭持之必要，當前所急，厥爲挽救危亡，求所以自贖而已！』因此，要消除西南與南京間的對立，不在協商所謂和平，講求什麼合作，而先決的問題，是在於南京有無誠意放棄過去以至現在叛黨賣國、爲禍人民的荒謬意圖。換言之，即是南京有無誠意接受西南『齊』『有』兩電之建議，澈底改革其錯誤政策之決心，并接受魚日通電，立即實行民國二十年上海和平會議之一切方案。否則空言和平合作，西南斷不能爲了『上下一致』便隨同南京去叛黨賣國，投降日帝國主義！

記得去年鄒海濱先生曾在三民主義月刊中發表一篇『國民黨黨員目前應取之態度。』該文中鄒先生堅決而又懇切的說：

『國民黨黨員係信仰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即救國主義，故國民黨黨員應負救國之責任。』

自國民黨北伐成功，實行訓政，國內外喁喁望治，曰國民黨庶幾實行三民主義以救

國歟？而今則如何？……單就事實而論：

以言民生，祇見南京政府剝盡中國國民，一切生產機能，將中國整個利權奉送於帝國主義者，而日仰其餘瀝，以自固其地位，……而當局則以帝國主義餘瀝之恩惠，侈然發其金錢萬能，即武力萬能，統一中國，完成獨裁之酣夢，是不特渴澤而魚，實且飲鴆自甘，螳螂日思捕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後，吁，可哀矣！

以言民權，不特選舉，罷官，創造，複決四權之行使，無從着手，甚至人民身體言論集會等等自由，亦悉行剝奪。一切社團非供其利用，即不能存在；一切報紙，非供其宣傳，即悉遭停閉；至最近藍衣社暗殺團成立，而更以多量金錢，欲殺盡一切不肯爲其臣妾者以爲快！甚至不惜爲敵作僥，解散一切救國團體，禁止一切救國言論，夾擊一切救國義軍，嗚呼，以垂亡之國，人民一有救國言行，即爲罪戾，吾國民尙有措手足之地乎？民權云乎哉！

以言民族，則更痛心！近年以來，不但不能將不平等條約取消，甚而至于更訂若干不平等條約，華僑紛紛被迫回國，無法救濟，外債日日加重，民生無機，最奇者無過於九一八以後，以不抵抗爲主旨，始失吉遼，繼失黑龍江，三失錦州，四失榆關，五失熱河，六失長城，以至冀察各地：失地之張學良，恃爲股肱，抗日之義軍，予以裁制，卒之貫澈其降敵之主旨，締結塘沽協定，此種亡國失地之事實，已開中外古今之奇局。最近馮玉祥，方振武，崛起東北，統十餘萬餓軍，與敵抗戰，疊復名城，卒全察境，乃利誘威脅之不足，必欲出十餘師與敵夾擊之，務以消滅馮方諸義軍爲目的，而僞軍李際春

，則必仰敵之意收編，漢奸郝鵬，則必仰敵之意釋放。抗日者罪在不赦，附日者須予優待，尤爲喪心病狂，凡有血氣之倫，決不出此，而南京抑若行所當然者，實不知世間有羞恥事矣！

以上種種，南京國民黨訓政時所發生之事實，國民黨能負其責乎？吾遍查 總理遺教遺囑，不聞有此政綱政策，即疊次全國代表大會亦不聞有此決議，至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更決議如何收復東三省，如何固守錦州，如何懲處失守土地之長官，曾幾何時，而南京乃一一背叛，以至於失去東北四省，失去長城，失去冀察各地，……凡此，早已非國民黨之行爲……。」

時隔年餘，而南京政府叛黨賣國，爲禍人民之罪惡，不但毫無悔改，反而變本加厲，較前尤甚！像南京政府這種叛黨賣國爲禍人民的行爲，西南能夠忍容，不加反對，反而與南京苟且合作，僞言和平，共同負擔此種行爲的責任嗎？退一萬步說，我人縱不能對南京軍閥聲罪致討，大張撻伐，然至低限度，亦不能與之合作，使世人明瞭此種行爲，爲南京軍閥之行爲，非國民爲行，使黨之叛黨賣國，爲禍人民之南京軍閥無所假借，以逃其責任！

基於上述各種理由，故西南對於這一次的和平合作運動，並無若何重視，蓋西南所堅持者，厥爲黨國的存亡問題，苟南京能翻然悔悟，痛改前非，重新站在黨國的立場，共圖挽救目前的危局，則西南與南京何事不可相商？反過來說，倘南京軍閥，還是一意倒行逆施，置黨國前途，人民禍患於不顧，則西南又何能默爾而息，不加反對？空洞的和平合作，是不能消滅西南與南京對立的形勢的，西南在齊電中所提出的救亡大計，早已鄭重的聲

明過：『同人等爲維護本黨，鞏衛國家，誓必堅持上述主張，奮鬥不已，苟利於黨國，任何犧牲，在所不辭！』所以目前的根本問題，不在於和平合作，而在於南京有無接受西南『齊』『有』兩電以及最近『魚』電之誠意。明白地說，即在南京能否不再背叛黨國的立場，重新負起革命的責任，以挽救目前黨國的危亡。假如南京能夠澈底地覺悟，則一切問題均可迎刃而解。

最近西南各中委對於蔣汪感日通電，曾在魚電以最誠懇之態度對五中全會申說：『同人等素主張統一，并主張和平統一，至於均權制度，則同人迭次主張，力求實行者。但和平統一與均權重行不重言，在目前而言，和平統一與均權，尤不必多求方法，應即實行成案，蓋民國二十年上海之和平會議，甯粵鄭重派出代表所決定之方案，即和平統一之辦法，亦即均權之辦法，年來國之不競，黨之分歧，豈有他哉，亦在乎未能實行此方案而已。』同時南京派王孫南來，攜蔣汪等聯函，請胡先生入京，胡先生一再表示：『今日所爭持者，爲國家民族生存問題，與主張政策之實行問題，決不能徒以情感兩字掩蓋一切，』所以他也希望南京能在根本上接受『齊』『有』兩電，及民廿年和平會議議定關於和平統一成案，實踐前言。并提出治標者三事：一，即須開放人民言論集會出版之自由；二，須確定入川剿共對西南各省并不作大兵壓境之威脅；三，於此間朋友同志，不得敵視暗殺，而猖獗殺人之組織須即解散。由此，從各方面觀察，均可證明西南與南京間的對立，其所爭持者，乃是關係整個黨國的存亡問題，除此而外，西南對於南京各個人的關係，決無絲毫成見或隔閡。所以西南與南京的對立，是護黨與叛黨的對立；救國與賣國的對立；也即是

革命與反革命的對立；西南提出的一切主張，不單是代表西南，而是代表全國的人民爲民族國家爭生存，決非黨的問題的糾紛所可比擬的。

明白了上述的基本觀念，則西南對於和平合作的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故西南與南京今後是否仍舊對立，這不在於和平合作是否成功，而在於南京有無誠意接受西南的建議，澈底改變過去一切錯誤的意念與政策；否則西南爲黨國計，爲四萬萬人民計，決不能放棄黨國立場，與革命的使命，聽任叛黨賣國者竊弄政權，危害民族國家。所以西南所希望的是產生革命的能爲三民主義而努力奮鬥的新政府，並不是祈求所謂『和平合作』，與南京合夥去做叛黨賣國，爲禍人民的盜賊！

和平前途之瞻望

一月來和平之局，已一傳再傳，而實際局勢，則去和平之局益遠。王寵惠氏瀕行，發表談話，則云：關於和平協作，雙方當已有誠意。又云：今已有可能性，惟望其至於實行耳。并自承奔走之任務，至此已告一段落。然在則和平前途，無惑乎已呈顯其黯淡絕望之象矣？

我人自始爲和平協作之贊同者，而胡展堂先生，則歷年以來，持和平統一之旨尤切。彼惟贊成和平統一，故反對軍權統治之南京政府，更惟贊成和平統一，故民二十年，始遭蔣中正之監禁，而民二十年冬之和平會議，胡先生所奔走號呼，始底於成者，尤足證其促

成和平統一之熱誠也。自南京軍政當局發表感電後，胡先生等曾於本月六日覆以一電，主張實行二十年會議成案，益知和平統一之途，已無待他求。則我人之擁護和平統一而必欲實現之，固三年來如一日也。

胡先生不云乎：

故今日而尚協商所謂和平，講求所謂合作，則先決問題，即爲南京政府是否有澈底改革其錯誤政策之決心，與是否有接受我人主張之決心，此兩者必須先有事實證明，庶幾余有以安慰其良心，鼓動其興會。

於是在根本上，即爲接受齊有兩電及民國二十年和平會議所議定關於和平統一之成案，實踐前言。別列治標者三項，尤無一非切要易行之事。如南京當局誠欲和平，則和平之坦途，舍是其又奚擇？且胡先生所要求者，僅實踐前言而已。當局者謂對於和平協作，實具誠意。乃前言且不實踐，顧可謂爲有誠意耶？

今南京當局，不從事實上求所以和平之道，而惟空言粉飾，高唱和平，偽造宣傳。如胡先生即北上也，協商已有結果也，某人決擁護中央也，擁護中央與否，我人姑不欲深求，然胡先生固明明表示不能北上矣，乃善爲之辭者，又造爲「天冷畏寒」之故而遲之至於明春。以堂堂自命爲中央之機關，乃日以欺騙國民爲能事，其卑劣爲何如？似此粉飾和平，不尙實際，尤不知其意何居？此實爲我人所甚疑訝者。

或者曰：南京如此宣傳，僅爲一時推卸之計與緩兵之計耳。南京造爲和平之謠，則將自居爲和平協作首唱者，胡先生而不北上，則爲破壞和平協作之罪者，唯胡先生負之，如

此而兼併西南，有辭可藉，此推卸之計也。南京之兼併西南，非有充分之財政不可，當局羅掘已窮，則亟欲藉和平之粉飾，爲舉借巨款之計，且用爲兼併西南之資，此緩兵之計也。當局而固如是，我人證以對胡先生提治標三項之絕不接納，亦正無以難之。然則破壞和平協作之責，又究將誰負之？更不待智者而後知矣。

顧本報今日刊載上海特約通訊記者天漫君之通訊，則謂：

在此次和平協作運動中，蔣系一部份人亦確有此希冀。蔣本身則感於外交財政之困難，故雖寤寐不忘其武力統一之謬策，亦未嘗不求所以轉圜之道。故於此次王寵惠氏之和平協作運動，亦具有相當之同情。……於胡先生所提之數項，亦微有逐漸實行之意嚮。

又云：

惟政學系及改組派份子，則極爲反對，雖不敢明目張膽，然暗中阻撓破壞甚力。

蔣中正是否如此？我人未可得而斷，然政學系及改組派份子之破壞阻撓，則可斷爲事實，且可斷爲必然之事實。其理由，天漫君於通訊中固已詳言之，然我人所欲鄭重申告者，凡胡先生所提示者，不僅爲和平協作之先決問題，亦且爲救民救國之必要步驟。胡先生固云：「成功不必自我，除主義政策之外，余復何所爭持？」彼豈與政學系改組派等同其志趣哉！然則本報通訊而確也，則蔣中正者，尤當舉胡先生所提示者切實行之，此不僅爲和平協作前途計，亦且爲救民救國之實際計，又更爲蔣中正之自贖其前愆計，蔣氏其有意乎？實爲黨國望之！

誠感與情感

赤裸裸地打開純潔晶瑩的心版，從心版上一條一條的深刻化的艱難，險阻，憂患，悲痛……之傷痕，泊泊不絕地流露出血誠，發而為言動以感人，這可以說是「誠感。」倘然心版上佈滿了虛偽，欺詐，狡黠，詭譎，奸險……等種子，偶而衝動起模糊的和平，合作之幻像來，也只是曇花一現，絕對不會劃上一個記號在心版上的，所以只可說是剎那間的「情感」作用。

五中全會之開幕，我早就懷疑到寧方之未肯出於真誠：五中全會之閉幕，竟然我所懷疑的得了事實的證實。寧方要維持「廬山傳統」的錯誤政策，所以西南魚電的主張，置而不議，這些逃不出明眼人預料之事，又何須深論：不過我們終究可以從這回五中全會之結果，得到很明白的「真切的誠感」和「虛偽的情感」之分野。我再讀過胡展堂先生與王孫兩氏晤談的內容，也更可以得到十二分清楚的「誠感」與「情感」的界說。

胡先生對王孫所談，純然出於誠感：因為一字一淚，都無不是三年來一貫的主張，也無非為挽救國家民族，為實行主義政策。意志薄弱的人們，不能把「君子愛人以德」的態度來度君子之腹，總是受了麻醉一般，妄事揣測，竟播為「胡決北上，」「胡偕王入京」之消息，其為利用新聞政策者張目也無可怪，若認為消息靈通，那就肉眼不識泰山了。

胡先生對王孫所談，雖然是要言不繁，而胡先生的個性怎樣，可以得到一個很清晰的

素描。簡單地說，「胡先生是以理性支配感情，以良心激發誠感，根據主義決定主張，貫徹主張決定行動的一個人。」認識了胡先生是怎樣的一個人，那就可以認識到誠感與情感之對立，也非胡先生之所願，而是胡先生之所悲！爲了事事重誠感，所以不爲利誘，什麼地位問題可以不談，也不爲威迫，什麼武力暴力都無足戒懼。爲了事事重誠感，所以自己的行動，決定於主張之實現，除了國家民族之存亡問題與主義政策之實行問題外，無其他私人情感可以掩蓋其主張。爲了事事重誠感，所以無人能夠支配自己之出處行止，無時不受主義與良心之監督，由克己以感人。爲了事事重誠感，所以中立而不倚，不靠什麼軍隊來造個人背景，也不挾什麼小組以自重，更不能與一般「阿媚取容」的「錯誤政策讚美者」同流合污。爲了事事重誠感，所以會興起無緣的大慈，同體的大悲來；要開放人民言論集會出版之自由；要確定入川剿共，對西南各省，並不作大兵壓境之威脅；要對於朋友同志不得敵視暗殺，而猖獗殺人之組織須即解散，這可以說是一個白璧無瑕的心理機構。橫逆之來，只有增大這個心理機構的活動力罷。

從反面瞧瞧那與「誠感」對立之情感方面，事實告訴我們：（一）利用敷衍籠絡手段和分贓收買政策，希冀完成其政治團結之假面具，同時依舊把持着「對內不協妥，對外不抵抗」的「武力統一」之鐵棒。（二）依舊維持北洋軍閥，政學系，安福系準共黨，親日派，國家主義派……之集團，不斷地幹其叩頭賣國之勾當；更載起「政治團結」之假面具，對外表示統一，爲大借外債之準備。（三）從前種種「決而不行」的罪惡，怙而不悛還不止，連最低限度之和平會議決案也不接納，其所謂和平合作，乃一時下意識之衝動，那又何疑？

(四)檢扣新聞，箝制言論之文化統制，政策依舊不變，暗殺之非法組織依舊環伺以待異己，和平的曙光，那能從兇惡的陰霾中透露出來？惟天下至誠乃能感物，像這般的事態，怎樣能夠取信於人而與之合作呢？

我再假借基督說的「視敵如友」一句話兒來說說誠感與情感的分判。凡是事事重誠感的，那就「對事不對人」之外，還依其本來之德性「視敵如友」，所以舌敝唇焦，總是希望他人下大決心，徹底改革其錯誤政策，還代國人請命，希望他人放棄其武力政策和暗殺手段。反是，事事重誠感的，那就會今天可以去桃園來結義，明天就可以去戰場來廝殺；今天可以虛心傾教，明天就可以忍心拘禁；今天可以置酒高會，明天就可以敵視暗殺。總而言之，誠則無物，不誠才會情感隨時衝動，反覆無常，養成「視友如敵」的惡根性。基督有知，也會嗟嘆自己性靈怎麼感格不到這個冥頑的教徒罷。

佛說：「萬法唯心造。」打破苦悶的時局，在於打破「虛偽情感」，接納「真切的誠感」，而以事實為之證明，那就對私人，對國人，都可以自問良心而無愧。我們因為同情於「視敵如友」，而不能同情於「視友如敵」，所以不能不進最後之忠告。

矛盾之反傳

有組織之新聞統制，隨其幹部所在，而不斷的對於正義方面施以種種反宣傳，安足為怪？且種種之反宣傳，即其幹部之基本工作，不特不足怪，且應為之諒。不過超越一貫的

步驟，而循矛盾律以熒惑人之耳目，則誠有所大惑不解！

日前對胡展堂先生自動出洋之謠，記者曾爲文闢之，猶曰對反宣傳之糾正而已。不謂糾正之墨未乾，而違背事實之反宣傳接踵而來，如所謂「同時胡展堂對其出處，亦有極鮮明之表示：大要爲請中央出兵入川剿匪，以便共匪得到澈底解決；並表示彼日間即放洋，爲中央宣傳政策，五代會前歸國參加。……」此種無稽之譎言，接二連三，果何爲者？不久之將來，卽爲事實所打破，暴露造謠者之無意識，於事果何所補？此猶未也，更有其矛盾之反宣傳。

胡先生發表對王孫兩氏晤談之內容，爲其歷來一貫的主張，且爲其對解決時局意見癥結所在，不特王孫兩氏所承認，卽南京之蔣汪亦所承認，何以新聞統制下之反宣傳者竟不察事實，一則曰：「對於胡先生這番言論祇有認爲是胡先生的失言。」再則曰「深恐胡先生再陷於「失言」之地位，而不自覺。」三則曰：「但所謂治標三事，則我們尤覺莫名其妙！」四則曰：「爲團結的話則可，爲破壞團結的話，則未見其然。」此等類似訓話式之語氣，吾知恃其背後猙獰兇狠之魅影爲之維護。故大言而不慚。不過此等類似訓話式之語氣，卽反宣傳者之太上首腦——獨裁領袖，在和平商討中，猶未敢認胡先生對王孫兩氏所表示爲「失言」，「爲「莫名其妙」，「爲「破壞團結的話」，「此可徵之於王孫兩氏之所宣示，反宣傳者之太上首腦之親筆函件，以及最近南歸之西南中委。最奇者，反宣傳者對胡先生談話加以類似訓話式之語氣後，翌日卽登載王寵惠博士如下之談話：

「中央最後之復電，業已送達，並經與胡先生作最後之商洽。復電內容，雖不便宣佈

，然以個人觀察，今後和平統一希望甚大，是則惟可爲告慰者。胡先生所云治標三事，據胡先生之意，以爲此實急切須辦者，即中央當局，亦確有接納之可能，惟最後階段，尙有待於相當時期之後。其所以須待相當時期之原因有三：一爲言論出版自由，須集思廣益，方能確自定由之標準。二爲入川部隊，須有相當時期之調遣，不能急切完全實現。三爲機關之改善或增刪，亦非短時間內所能辦到。

由此可知反宣傳者所妄指胡先生爲「失言」，「爲「莫名其妙」，「爲「破壞團結的話」，在王博士所謂中央，皆未嘗認爲「失言」，「未嘗認爲「莫名其妙」，「未嘗認爲「破壞團結的話」，只有認爲「確有接納之可能」而已。在同一宣傳機構而發爲矛盾之反宣傳，我無可批評，惟借其掌以批其頰，認其爲「失言」，「爲「莫名其妙」，「爲「破壞團結的話」，決非過當也。

然則何爲而發此矛盾之反宣傳，解答此問，不外下之兩點意見：

- 一、反宣傳者受其太上主腦之指使，一面自己表示謙恭敬仰的態度，事事認爲「確有接納之可能」，「一面利用其徒衆作矛盾之反宣傳，以示一切的接納皆爲虛偽的接納。
- 二、反宣傳者自身不滿意其太上主腦之表示謙恭敬仰的態度，更不滿意其太上主腦對胡先生主張認爲「確有接納之可能」，所以特發爲矛盾之反宣傳，使人人皆能察其太上主腦對於一切商討皆無誠意。

前者則爲獨裁下新聞統制之狡猾手段，後者則爲反宣傳者之背叛行爲，二者必有一於此。如謂不然，不妨將前後矛盾之稿，剪寄王孫兩氏以及所謂太上主腦，問其對於胡先生

所表示之意見，是否同情於反宣傳者之認定胡先生爲「失言」，爲「莫名其妙」，爲「破壞團結的話」，「得其解答，則記者上方所解答之兩點，或者尙屬疑問，亦未可定。

所謂和平協作

從去年到今年，中國政治上寧粵和平協作的風雲，斷斷續續，沒有一個交代。似乎是等得不耐煩吧，一般憂時之士便表示一種好像爲和事老的意見，說道蔣介石應該回回頭，胡展堂先生在條件方面應該讓些步，而王亮偉先生則應該多多的努力；他們以爲這是和平協作的終南捷徑，實則天下事之荒謬，未有甚於此者。

自然，天下沒有一個人具有絕他人自新之路的權利，同時在原則上，誰個不希望蔣介石能夠毅然自新，但原則只是原則，事實又是事實。自從去年到今年，雖經過王亮偉先生的奔走南北，然與蔣介石還是從前的蔣介石，他的軍權還是籠罩着南京的政權黨權，而且他還是緊握着降日的政策，在他所主持操縱的五中全會內，非但沒有提到抗日兩個字，簡直連中日問題都未加討論。在這些事實的面前，我們對於蔣介石自新的希望，終成泡影。

進一步講，我們雖則不能武斷蔣介石天然就有一種降日的心臟，天然沒有改過自新的本能，但是我們可以從他現有的環境，斷定他不容易自新。蔣介石企圖獨裁，但獨裁也是需要羣衆的，於是政學系安福系改組派藍衣社等等便做了他的台基，於是蔣介石固然利用

了他們，而他們也便包圍了蔣介石，於是政學系安福系改組派一日不去，則蔣介石不能改變其降日的態度，藍衣社一日不去，則蔣介石無從變換其恐怖殘殺的政策。久入鹹魚之市，不聞其臭，蔣介石天天在政學系安福系改組派藍衣社燻陶之下，還能呼吸到什麼新鮮空氣，何況「爲善如割肉？」

其次，我們要談到一般憂時之士對胡展堂先生的希望。似乎這是近來的一種傳說，說是胡先生對蔣介石提條件，因此便希望胡先生在條件方面讓些步。其實這完全是一種錯誤的認識或觀察。我們可以堅決的說一句，胡先生只有主張，沒有條件。沒有一個人，可以相信胡先生以取得國民政府主席或行政院長的權位爲放棄反對軍權統治的態度之條件，也沒有一個人，可以相信胡先生以取得蔣介石幾千萬元的金錢爲放棄反對獨裁，反對降日的態度之條件，然則胡先生的條件在那裏，又何從而讓步？幾年來胡先生發表了好多談話和論文，從這些言論中，我們在什麼地方可以指出條件所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主張，而且是一貫的主張，不是條件；既是主張，便無讓步之可言，主張只有對或不對，因而只能堅持或放棄。而且胡先生的主張，不是他個人的主張，也不是以個人的關係而提出的，他是站在全國全黨的立場而提出的，所以我們反對胡先生的主張則已，不然，一方面又信仰胡先生的主張，一方面又希望胡先生讓步，這是絕對的矛盾，是自我否認！

進一步說，寧粵和平協作之沒有成功，也便是因爲胡先生對蔣介石沒有條件，只有主張，如果胡先生對蔣介石有條件之可言，則所謂和平協作也者，早已不成問題。同時我們認爲中國國民革命之所以能繼續不懈，中華民國仍有可救者，也只是因爲胡先生沒有對蔣

介石的條件，而只有對黨對國的主張。

至此，我們對於所謂寧粵和平協作，應該可以把握住問題的重心所在了。我們固然也希望做這運動的中間人之王亮偉先生能夠多多的努力，以免將來重大的流血，但是也和對任何人一樣，希望不要拿胡先生的主張看做條件。

主張與條件

護黨

主張除了其所根據之主義爲其先決之條件以外，就沒有其他之條件。隨時動盪，因利思遷，條件變易而主張同時變易，這只可期之反覆之小人，而不可期之中立不倚之君子。國論龐雜之今日，人們競於贊美軍權統治爲攫取地位之終南捷徑，因而競於維護錯誤政策爲迎合軍權統治之不二法門。以這麼的條件爲主張，滔滔皆是，但決不能和根據主義爲條件之主張相混同。

明白了這點，纔可以對於以主義決定主張之人得到正確之認識與批評：否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了。

我們相信在這個內憂外患，天災人禍，交相煎迫之關頭，只有祈求得一個永恆的和爲全民利益計算的而又根據主義爲條件的主張實現出來，奉行不悖，纔可以得到挽救的希望。要是覆轍相尋，徒以私人感情爲條件來決定關係國家民族存亡之主張，可說是等於兒戲，於事無補。和平商討之難得完美結果，也不外

(一) 根據主義爲條件之主張

(二) 維護錯誤政策爲條件之主張

根本成了「正」「負」對立的兩方面而不能相容罷。在(一)之一方——「正」的方面——始終緊握着主義之鐵棒，無可遷就，無可假借，也無可改變，除了希望錯誤政策維護者之拋棄其政策與歸到主義之路而從同其主張之外，便沒有什麼的請求，更沒有什麼的條件。惟其這樣，纔可以由百折不磨之主義，隨時流露出百鍊不變之精誠來。把這樣的精誠去謀團結，纔得到永恆的相安和達到爲全民利益計算的目的；而斷不會「止於條件之交換」「相安於一時」，更不會「按劍相防」，「支離滅裂」。如果存了偏見的話，只爲(二)之一方——「負」的方面——說漂亮話，全不問事實怎樣，反責備(一)之一方爲「廣播流言」，爲「挑撥離間」，恐怕「言之者無罪，聞之者無得而戒」罷。

說到這裏對於所謂「胡氏建議之三事，中央既已完全接受」的話，我不能不舉出一個反證來，以塞那「利口辨詞」了。就胡展堂先生建議三事之第一項「開放人民言論集會出版之自由」來說，固然是胡先生代國人來請命，而非爲其個人來要求；但是，我們從事實之告訴，關於胡先生最近之論文和談話，在軍權統治下之文化統制，不容有隻字之刊載。還聽得最近由北方南下之某名教授說：在南京北平甚而上海，惟找一本或是一篇胡先生之近著，幾同於向水中來撈月。這就可以見到所謂「完全接受」之程度怎樣了，還說什麼「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呢？

胡先生始終緊握着主義之鐵棒，要反軍權統治而爲三民主義之治，所以其一貫主張之

表示。甚而對(二)之一方有所建議，都無非爲救黨爲救國，而絕對不是爲自己之地位和出路打算，這真要持偏見的人們把眼光放遠來認識的了。北上嗎？出洋嗎？那裏可以拿來造「共赴國難」之條件？更那裏可以拿來造「實現主張」之條件？主張之接受與否和實現與否，全然視錯誤政策之改變與否來決定，個人之行動絕對沒有絲毫之關係。如果主張還未由接受至於實現，貿貿然說什麼「吾舍魯奚與矣」來參加軍權統治之集團而嚷着共赴國難，這斷非尊重自己人格之胡先生所屑爲。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胡先生發表與王孫晤談經過，有這樣的說過：

「余與汪蔣諸先生之私人感情，至今并無變動，今日所爭持者，爲國家民族之存亡問題，與主義政策之實行問題，決不能徒以情感兩字掩蓋一切也。故今日而尙協商所謂和平，請求所謂合作，則先決問題，卽爲南京政府是否有澈底改革其錯誤政策之決心，與是否有接受我人主張之決心。此兩者必須有事實證明，庶幾余有以安慰其良心，而鼓勵其興會。」

由此可知胡先生始終不屑談什麼的條件。簡括地說：「主義就是主張的條件，實現主張就是合作的條件。」胡先生還不只不肯以地位權利爲條件，也深信除了主義所生出來的自信心和感召力以外，就沒有其他的力量，也從沒有倚恃什麼的力量來實現自己主張之動念。國人之崇仰其主張，國際之尊重其主張，也因爲有了這個認識的緣故。至於詛咒他人之擁護胡先生主張爲「吹毛求疵」，爲「刁難當局」，更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說什麼「資之爲要挾具，爲敲門磚」，這真是語無倫次。

有些人以爲先進各國，各黨派爲避免糾紛的緣故，都有所謂「佔若干席」之分配，以爲和平商討之癥結，還是在於這一點，那就和認「意志堅定」爲「倔強」同一錯覺了。無論胡先生個人始終沒有這種意念，就是擁護胡先生主張之忠實同志也始終沒有這種意念。胡先生惟其要打破「分贓式」之謬見，所以與王孫晤談也說過：

「余之出處行止，無人能支配之，惟無時不受主義與良心之監督。如可告慰於良心，無愧於主義，則余之北上南行，均無問題。余生平不逆詐，不億不信。當此國家多難之秋，惟望當局有澈底改革之實際，成功不必自我，除主義政策之外，余復何所爭持？」

那麼，以「佔若干席」爲條件之調言，可以不攻而自破了。雖然還有一居心叵測者之故事「詩張爲幻」，還有一駁之價值嗎？

主張與代表

護黨

負麗太空的太陽，持着不動和不變的態度，把光明普照了顆顆的行星，光之所到，便是太陽之所到，那麼，可以說，太陽除了光明，就沒有其他可以造他的代表的了。一個堅信主義，緊握良心，把「磨而不磷，涅而不淄」之生平節氣，消掉那「三日無君，則皇皇如也」之投機魅力而造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超越人格，這樣的革命領袖，那就無可以造他的代表，除了他自己的主張以外。因爲主張受了主義與良心之

支配，無論空間上時間上都可以尋出一貫的聯繫。所以由悠久的感召，不期然而得到一般革命者的共仰，由其仰的集中，不期然而孕育出革命的新機，那麼，可以說，主張之所及，不啻其代表之所至，像光明之代表了太陽一樣。

人們每陶醉於植黨營私之迷夢，始終憧憬着「私人條件之交換，便是政治糾紛之解決」之信條。也因這個信條會施之利令智昏之善變者，既得了「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之經驗，便想把這個經驗來演駕輕就熟的把戲，以為抱定一貫主張的革命領袖也和善變者之容易誘惑，不斷地佈上濃厚的「和平，合作，統一」的烟幕，同時，不斷地散出「某主黨，某主政，某主軍」，某來，以某位置相讓」的流言，使國人起了錯覺，以為時局解決之癥結，無非是地位分配之妥洽，也以爲革命領袖之出處，無非條件交換之完滿。認識未清之報紙，也像煞有介事，大事宣傳，都不外受了這種烟幕和流言的掩蔽的緣故。

在錯覺未矯正歸大正覺的當兒，隨時隨地都容易起了「杯弓影蛇」般的幻象來。明明一個光明磊落的革命領袖，不逆詐，不億不信，其一動一靜，無時而不昭示於人，而且貫始徹終，祇有以主張爲個人代表，從沒有以朋友爲其個人代表，進行什麼的商討條件；那曉得無端因了一二朋友之私人行動，便憑空加上那朋友們一個代表的資格來？不說是代表入京商洽，便說是在滬已有進一步的商討，這真莫名其妙！如果一個「出處行止，無人能支配之，惟無時不受主義與良心之監督」的革命領袖要派代表來幹私人情感的勾當，那早就在幾度南下的使者面前得到「相視而笑」的結果了，何必等到了今日才派代表這麼多事呢？何況歷次使者南來，都是「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斷不會反而行之理。我們沒

要忘却革命領袖這幾句的詔示：「人之感情，必須受理性之支配。如徒重感情，喪失理性，不啻自滅良知，此種感情，實不值我人重視」。他不要感情造他的代表，更何需乎朋友來代替他說感情話頭的代表呢？因此，我便切切實實下這麼的一個肯定：感情不能造他的代表，朋友也不能造他感情的代表，祇有主張是他的真正代表。

於此，我便窮究社會怎樣會對於政治中心人物之認識這樣淺薄，那是有了兩個陰影潛伏在多數人之下意識而未散：

(一)從前北洋軍閥時代，政潮起伏，更勝迭負，總不出一「利害相同則合，利害相反則爭」。在將合未合之先，必然是使節往來，代表盈廷，各盡縱橫捭闔之能事，其結果脫不掉分贓式之地位分配，權利分配。這種把戲，成了司空見慣的表演，人心目中都目一個走馬燈式之憧憬。

(二)軍權統治因襲了北洋軍閥的惡習，還變本加厲，成了惟我獨尊的獨裁，所以對於一切，不用威迫的手段，便用利誘的手段。代表疲於奔命之餘，一面與反革命集團通力合作，一面興起內戰來消滅異己，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毀紀亂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欲從虛偽的商討，謀粉飾的和平，也代表載途，僕僕來游說。這種把戲，也成了司空見慣的表演了。

但是，守着主義，本着良心的革命領袖，早就宣示過：「余不能如其他人等有甚多政治之手腕，以自掩其錯誤之行爲，爲求達到目的，即可不擇手段而行事者」。可知除了主張爲其代表之外，確然無須派什麼代表之必要。正義與軍權統治之分際在此；革命與反革

命之分際也在此。

軍權統治方面要和守着主義，本着良心的革命領袖之代表商討嗎？你盡量地接納了他的一貫主張，主張就會給你一個完滿的答復了。全國民衆們要同守着主義，本着良心的革命領袖之代表認識嗎？你把他悠久的革命過程中，尋繹了他的一貫主張，主張就會給你一個欣悅的見面了。你們沒要忘記！

「主張就是他的代表呀！」

甯方何以又佈了這麼的烟幕！

護黨

記者在「誠感與情感」一文（去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對胡展堂先生個人有這麼的簡單的認定：

「胡先生是以理性支配感情，以良心激發誠感，根據主義決定主張，貫徹主張決定行動的一個人。」

我想，胡先生有了三十餘年的革命歷史，有了自民報（同盟會時代在日本東京發刊之本黨雜誌）以至今日一貫的革命讜論，都可以證明這個認定是從許多的事實和言論歸納出來的。如果迷信着「十三年以後入黨的才是同志」一句口號的黨販子，縱然怎麼樣造謠，不說胡先生要北上，便說胡先生要出洋，也無足爲怪，因爲他們要拿這麼的本領來討黨飯吃。要是在黨有了相當的歷史和他位，而對胡先生也有相當的認識的人，還同一般黨販子

之肆口造謠，那真太近於無意識了。無怪昨天胡先生發表之談話，有這麼的幾句話：

「余之行止，無須他人代籌。而發言不顧實際，似亦足損及發言者之信譽，竊願其稍加意。」

然而，何以發言者明知這麼的烟幕，終究給當前的事實所衝破，而且在揭穿虛偽的和平商討的面具之今日，還不斷地公開宣示着：胡先生在短期內可以上京，中央願協助胡先生出洋，這一類的談話？這必然有很大的苦衷，我們責備賢者之餘，也該原諒他們。爲什麼呢？軍權統治下，發言盈廷，無非軍權統治之讚美者和擁護者，何曾有一人根據主義，指斥軍權統治一切錯誤政策之非；有之，只有離開軍權統治之胡先生獨自一個。胡先生雖然獨自一個，不靠什麼軍隊來造背景，也不靠什麼地位來養小組；而他的反軍權統治之讜論，早已博得救黨同志和救國民衆之同情，還博得注意東亞和平各友邦之同情。這種正義之潛力，任何武力和暴力，都不能摧毀其毫末。就是誣以「激於意氣，遠於事實」，也絕對沒有效力。這種情形，當爲明白事理者所深信而不疑。因而軍權統治者對之，軍權統治之讚美者和擁護者對之，就不能不深深嫉忌了。惟其是胡先生有了這種正義之潛力，而其主張更牢不可破，那軍權統治者和軍權統治之讚美者和擁護者，更不能不深深嫉忌而腐心去想對付方法了。

威脅嗎？利誘嗎？軍權統治者早已演過好身手來對付胡先生，而胡先生依然屹立不動，獨立不懼；那麼，除了散佈這麼的烟幕，還有什麼對付的辦法？不過我們不要忽略最近的烟幕，是有這麼的作用的：

(一)軍權統治之財政，陷於無可維持的境地，要向英美借二千五百萬鎊的鉅額借款，也要向日本繼續借款，所以不斷地佈上胡先生北上之緊張空氣，得來對外虛飾，說是中國已到了統一的段階了，使債權者放心。

(二)他們還佈上胡先生出洋之烟幕，以為胡先生離開了香港，就馬上可以散亂西南視線集中之焦點，徐圖分化的辦法，也得到統一的夢話來宣示友邦，而維繫其錯誤政策於不墜。

他們因利令智昏之故，為利己心之衝動，而發出這種不顧實際之談話，還可以曉得他們作偽心勞日拙的苦衷；至於竟然出發言者自說願以某席相讓，真可以說因智昏而至於失言了。胡先生對於「所謂某席」也者，早在民元之拋棄都督和民十四之自動解除代帥之事實當中，證明其視之如敝屣，不必信誓旦旦認「不作官」為進德之信條，才把「所謂某席」視之如敝屣的。如今却以讓賢而自詡於至德之泰伯，來博他人的同情，真是先聖後聖，其揆不一了。把目標放在「所謂某席」上，而不放在胡先生一貫的根據主義之主張上；自己去造軍權統治之讚美者和擁護者，而欲碩果僅留之反軍權統治者為自己之續；這真是言為心聲，由此，可以看到人格之分別。

我從幾個月來，看厭了這麼的烟幕，我很希望他們以後不再有這麼的無意識而遠離事實之動作，這是我對於他們的一個忠告。

不可以風的讓德

護黨

老子說：「上禮莫應，攘臂以扔。」把黨義當薪的野心家，由喊着「佔讓機關，爲其左派」而造到「不擇手段，有官便造，有利便圖，」從前也曾投入過共產黨之懷，攘臂以扔，三年來又投入軍權統治者之懷，在攘臂以扔，誰還信其重拾早已撕毀無餘之進德會「六不信條」而把「寤寐求之」之地位讓給他人呢？「巧言佞色，鮮矣仁！」我敢先武斷一句；這是不可以風的讓德。而且讓其所讓，非吾之所謂讓，德其所德，非吾之所謂德。

我因爲這麼的認定，覺得昨日發表那篇「寧方何以又佈了這麼的烟幕」一文未能暢所欲言，對於「倘胡先生願出任中樞之責者，余願退位以讓之」。這句話發言者得了三個新的認識。在發言者之意思以爲；

(一)他人之敦促胡先生命駕北上，主持中樞，也不過因一時感情之衝動，而博一時之好感，沒有誠意存乎其間的。我呢，就不同了；始終與胡先生要好，始終要敦促胡先生命駕北上，主持中樞，所以說；「三年以來，始終未變」。

(二)他人之盼望胡先生到南京共同負責，也屬空洞其詞，還類於請胡先生來趁趁高興的毫無實際。我呢，就不同了；我可以把自己攘臂扔來之地位讓之，所以說：「余願退位以讓之」。

(三)我之讓，固然能入之所不能，但是也有其限度：胡先生真是來嗎，我就讓之；不，就不讓了。這就因爲胡先生曾經對和平使者再三聲明自己之出處要磊落光明，斷不容有所謂「胡去汪來」和「汪去胡來」之笑話。明知胡先生之不來，又何妨一讓呢？我敢說：這三個新的認識，不啻從「光透視了發言者之肺肝。然而我絕不願徒以消極的責

備爲能事，還希望由消極的責備得到積極的感悟之結果。所以我對於寧方最近對於胡先生出處問題，仍不能忘掉以下幾種感念：

（一）爲什麼說來說去都只是「迎」呀，「讓」呀，「接納」呀，「不與較」呀，「協助」呀這一類不着邊際的話頭呢？

（二）爲什麼國事已到了走頭無路之日，還不覺悟到軍權統治者確然要猛醒回頭，由歧途踏上革命陣綫，歸到本黨的家園來呢？

（三）爲什麼依舊配起權利慾之徽，對於淡泊權利之革命者，硬要把支配問題來誘惑來欺騙呢？

（四）爲什麼胡先生一貫的主張，早已予天下人以共見，何以一面絕無忌憚地幹其於胡先生主張尖銳相對立之錯誤政策，一面還厚着臉皮說什麼「迎」呀，「讓」呀，「接納」呀，「不與較」呀，「協助」呀，這一類自欺欺人的話頭呢？

這幾個疑問，我想，寧方諸人都會感到無話可說，不只是發言者難以自圓其說。因此，我本着責備賢者之義，再有這兩層的認識：

（一）我所說過的軍權統治者之前期親信，與軍權統治者廝守了這麼多的時候；本該先清君側，把一般愚弄軍權統治者於掌上之所謂政學系，安福系，親日派，盡量剷除，才可以博得正義方面之同情，而得到真切之諒解。若任羣小之作祟，而欲正義之神從天降下爲之掩護，也屬妄想。至於一面對於正義之神敬而遠之，一面容隱羣小，任所施爲，豈不是期待羣小之推擁自己爲猢猻王嗎？豈不可笑？

(二)幾個月來，把胡先生之出處問題，造了一個口頭禪，雖然胡先生依舊是胡先生，胡先生的主張始終是胡先生的主張，不容易給他們造了私爭的工具。可見胡先生本人以外，他們口中之胡先生一個問題，早就把來造了私爭的工具了。就是這個動機，經已居心叵測，何苦還捫住良心，說什麼退讓的話來呢？這真是不可以風的了。

於此，我由這種不可以風的讓德，而聯想到錯誤政策之維持和反革命集團之潛滋暗長，再回憶到伍梯雲先生前年談話之爲具先見之明。伍先生說：「蔣汪之合作，純然私人條件之交外，而非政見之交換。蔣之利用汪，對外只欲汪居其名，而自己居其實，豈知汪固甘居其名，並毅然不顧一切，進而居其實。這是蔣之所大忌，而無如汪何？對內則政學系，安福系，親日派等，都是蔣所利誘而來，豈知汪「任邪勿貳」之手段，較蔣固爲高明，而蔣材汪用，不只與蔣平分春色，蔣亦無如汪何。」我們從事實之證明，伍先生這番話可以說由「塘沽協定是兄弟之主張」透視到今日「黃郛長內政」，「唐有壬辦理通郵」之種種的外交內政，也不必爲之申說了。

等於零的言論自由之開放

護黨

獨裁下沒有自由。獨裁下之文化統制，自然不會有言論自由。要言論自由之實現，除非是打倒獨裁之後，文化統制隨之而消滅。所以和獨裁對立之正義方面，雖然始終抱着言論自由之主張，因了獨裁者不肯拋棄其獨裁的權威，不由得把握着文化統制之鐵索，始終

箝制着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就終於不能實現。

胡展堂先生拳拳服膺總理「天下爲公」之遺訓，於和平商討中，爲國人請命，提出治標三項主張，其第一項主張就是：

「須即開放人民言論集會出版之自由」。沒有多久，便聽到了「中央對於胡先生治標三項主張完全接納」之消息，國人鑒於中央信用之墮墜，那敢輕信？雖然藍化報紙之不斷的宣傳。果然，本月廿四日中央第一五五次常會關於新聞檢查，便有這樣的決議：

「凡對於黨政之設施，有事實之根據，而爲善意之言論者，除涉及軍事或外交秘密，或妨害黨國大計外，均得自由刊布之；但不得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

這附麗了一大堆條件之決議，可以乾脆地下一句斷案：

「所謂言論自由之開放，完全等於零。」我們可以把條件分析出如下之條序：

- 一、事實之根據，
- 二、善意之言論，
- 三、涉及軍事或外交之秘密，
- 四、妨害黨國大計，
- 五、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

什麼是事實之根據？比方人民所認爲鐵案如山之事實，政府反指之爲造謠，那事實之根據便無從而確定之。譬之，塘沽協定，明明不限於軍事，而涉及於政治，汪兼外長竟公開聲明：「塘沽協定只限軍事，不涉政治。」如今涉及政治之種種事實——通車通郵等——擺

在面前，人民根據這些事實來批評，就決非政府之所能容忍的了。什麼是善意之言論？這全屬政府當局主觀之認定，殊難捉摸。大約贊美獨裁，歌頌賣國，便是善意；否則便是惡意了。胡先生忠告之談話，責備之言論，一向也視爲惡意而禁止刊載，其他的善意惡意之分判，可以不必深說。什麼涉及軍事及外交之秘密？在某種軍事某種外交之進行，與對於某種軍事某種外交之本質及其利害，加以批判而促起國人之注意，不可同日而語，更不可比擬於洩漏機密。譬之，淞滬協定，塘沽協定，海軍祕約……等，都是喪權辱國，藉外抗內的勾當，又怎樣能夠禁阻愛國者揭其祕密作救國之呼號？最近敵之侵察，無非塘沽協定祕密附件之爲祟，祕密終給事實之打破而消失其祕密，又何苦來！什麼是妨害黨國大計？毀黨造黨的大計嗎？叩頭賣國的大計嗎？藍衣社到處殺人，如史量才之被暗殺，已大足使妨害黨國大計者得了大大的教訓，那裏要多添了這條條件？什麼是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這更要使我發起笑來了。毀黨造黨成了事實，黨早已脫胎換骨成了一塊藍色的東西，還有什麼三民主義的成分？更看了藍化報紙不斷地在鼓吹獨裁政治，而不同情於民主集權制度，不知所謂三民主義究指什麼的三民主義？大約他們所認定與三民主義最相容之主義，只有法西斯蒂主義罷。

歸納了這五項的條件，還說什麼言論自由之開放？還說什麼「均得自由刊載」？還說什麼完全接納了胡先生治標三項之主張？羅蘭夫人所謂「自由，自由，幾多罪惡，假汝以行！」正謂此也。

我再可以拿出一個滑稽的故事來比喻這個決議。從前某甲應試，把他的文稿給他的朋

友某乙看，請預測會不會入殼。某乙說：「或者有萬一之希望罷」。某甲恨恨地罵：「簡直說一句無希望罷了，怎樣「或者」還不夠，要加上「萬一」來呢？」這個決議之五項條件，可同於某乙之所謂「或者」，所謂「萬一」的了。

我責備當局之餘，還要不嫌多事，進上逆耳的忠告。「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沒論古今中外，一樣地同此情緒。壓迫輿論的結果，只有激動起多數的共鳴。共鳴之結果，就是革命行動之取決了。如果想在文化統制下，成就了「普天之下，都是御用言論」，可以說一句：「徒勞夢想」，我敢斷其無實現之一日。英之泰晤士報，何嘗不是政府權要甚或政府黨所主持，而批評政治，「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一，何嘗有所箝制，有所統制呢？我終於期望甯府當局根本放棄其錯誤政策，萬萬不可剝奪人民言論自由之權利，來維繫其錯誤政策。

爲甯粵和平協作告浙江青年

浙江健行社

最可敬愛的青年們！

醞釀已久的寧粵和平協作，前途又陷於黯淡的境地了！這不是但中國國民黨的不幸，而尤爲民族國家的不幸！爲什麼寧粵和平協作不能順利的進行？這些關係雖極複雜，然要而言之，則不外

一，蔣介石缺乏和平的誠意和決心，他不能把一切包圍阻撓他的黨蠹如改組派，政學

系，及安福系等徹底肅清，剷除和平途中的障礙。

二，奔走和平者對於南京政局無徹底改革的企圖，祇以對人爲目的，去人爲目標，對於和平的實際努力，並不能認識清楚。因此，醞釀數月來的寧粵和平協作，到現在便不得不日益黯淡了！

我們知道：寧粵所以不能和平協作，已不是表面上的黨內政見政策之不同，而是根本上救國的爭持。因爲粵方不能同意於寧方數年來，叛黨賣國的一切謬誤政策，自然不能和寧方協作，以分担此種叛黨賣國的責任。所以寧粵協作的先決問題，必需要甯方拋棄過去一切的謬誤政策，振刷精神，更新現局，使和平協作後，以實現黨的主義，政綱，和政策爲中心，而不以對人爲目的。如此，和平協作的前途，始有曙光之可言。

然而目前的蔣介石在一切黨蠹包圍阻撓下顯然沒有此種誠意和決心，而奔走和平協作者，亦不能以實現黨的主義，政綱，和政策爲中心運動，而祇以疏通雙方個人的情感，甚至利用和平協作爲政爭的工具，達到排斥某人而代之以某人爲目的。像這種卑劣的思想，自然與和平協作的目的相距十萬里，粵方黨政領袖，久已在「有」電中表示過：「同人等認爲國家危急至此，黨內問題，實無爭持之必要，當前急需，爲挽救危亡，求所以自贖而已」。胡先生個人也曾謂：「余之出處行止……無時不受主義與良心之監督，如可告慰於良心，無愧於主義，則余之北上南行，均無問題」。由此，可見粵方希求和平協作之目的，在於挽救黨國的危亡，而胡先生的出處行止，又純以主義政策爲歸據，拋棄了黨國的立場，避開了主義政策於不談，則和平的本身已無意義之可言，又何能使寧粵合作呢？

最可敬愛的青年們！在這民族國家的危亡已到千均一髮的緊急時候，凡屬國民，尤其是具有熱血的青年們，都應該團結精神，萬衆一心的站在青天白日的旗幟下，誓死反抗一切帝國主義的殘暴侵略，以爭取民族國家的生存，衝破亡國滅種的慘禍。寧粵和平協作是否能夠達到圓滿的目的，固然在於蔣介石是否有誠意，有決心，接受粵方挽救黨國的意見，毅然剷除障礙和平的一切黨蠱——改組派，政學系，安福系，和澈底變更軍治，回復到黨治民治的精神，然而尤須我們有覺悟的青年起來號召民衆，擁護粵方所提出的以黨的主義，政綱，和政策爲中心的和平協作運動。只有偉大的民衆力量，加緊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工作，才能促使南京軍閥的覺悟，不敢再幹叛黨賣國的勾當！

促成甯粵的和平協作，澈底糾正南京政府過去一切的謬誤政策，恢復中國國民黨的新生命，建立新的革命政府，領導全國民衆爲民族而奮鬥，爲國家而圖存，乃是目前國難嚴重時期中的迫切需要。因此，我們要努力實現這些口號：

促成甯粵的和平協作挽救黨國的危亡！

剷除破壞和平的一切黨蠱——改組派，政學系，安福系！

和平協作要以實現黨的主義，政綱，政策爲中心！

反對假借和平協作爲政爭工具的卑劣政客和官僚！

擁護粵方對於和平協作的一切具體方案！

寧粵和平協作之梗

仲康

南京軍閥統治中國的結果，造成了「九一八」以來空前未有的國難。到今日，國難不但未曾解除，反隨南京統治投降日帝國主義而加深了。

在這民族國家的危亡已到千鈞一髮的緊急時期，凡屬國民，只要他不是漢奸，賣國賊，都應該團結起來，萬衆一心的站在青天白日的旗幟下，來誓死抵抗那日帝國主義的殘暴侵略，爭取民族國家的生存，衝破亡國滅種的悲運。何況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三民主義的信仰者， 總理的忠實信徒，更應如何地犧牲一切，親愛精誠，遵循 總理的遺教，共同一致的負起救國的責任，領導全國民衆而奮鬥！

然而不幸，在這嚴重的國難時期中，中國國民黨不但不能共同一致負起救國的責任，領導全國民衆奮鬥，反而有一部份喪心病狂的黨員自甘依附軍閥，去勾結日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餘孽——政學系，安福系等——極力破壞黨內的團結。此外，雖有一二奔走黨內和平協作運動者，然既不能以實現黨的主義，政綱，與政策等爲中心，祇注意於私人情感的調和，與所謂意見的接近，自不能希望其有圓滿的結果。至於藉和平協作爲政爭之工具，以達到排斥某人，位置私人爲目的，則其卑污之心，更不足道了。

中國國民黨爲什麼會內部分裂，形成目前寧粵對峙的局勢？這些原因雖極複雜，然要而言之，則不外乎爭持救黨救國與叛黨賣國的根本問題。例如在黨務方面，簡要的說

，粵方主張：中國國民黨應該是統一的，黨內既不能有派，黨中更不該生黨。三民主義是黨員唯一應該奉行的主義，黨員的任務，祇在如何完成革命，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國家。然而甯方則不然。他們把中國國民黨做招牌，藉黨的掩護，在黨內各自樹立黨派，爲其鞏固私人的權利。如蔣系下的法西斯蒂，汪系下的改組派，他們公然宣稱：擁護委員長爲本黨之唯一領袖；或『擴充本派地盤，提高同志地位。』他們如此這般地在黨內營黨組派，朋分權利，且不惜幹出一切反中國國民黨的勾當，更遑論奉行三民主義，完成本黨革命的任務？粵方在『齊』電中鄭重的提出『嚴懲一切淆亂社會危害黨國禍首案』，而寧方顯然是不能贊同！在政治方面，粵方的持義爲抗日，剿共，與推翻軍閥統治。而甯方則不但不抗日，反而對日投降屈辱，曲盡獻媚奉迎之能事，置喪失民族利權於不顧；不但不剿共，反而縱共以禍鄰省，甚至視剿共爲其消滅異己勢力，奪取他人地盤之唯一妙策；不但不推翻軍閥統治，反而積極的集中一切權力，握在軍閥一人之手，實行其最高無上的個人獨裁！很明顯的，這些問題的爭論，已不是黨內政見政策之不同，而是根本上救黨救國和叛黨賣國的嚴重問題了。所以目前粵寧的對立，嚴格的說，已不是黨內之爭，而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宣戰！今日中國國民黨內部之不能一致，正是因爲粵方不能贊成寧方去賣國，更不能隨同其叛黨的結果！

然而粵方仍希望寧方能夠早日覺悟，拋棄過去一切錯誤的政策，重返黨國的立場，振刷精神，更新現局，以挽救當前的國難。胡展堂先生『對事不對人』，『換藥不換湯』，以及『有』電中『同人等認爲國家危急至此，黨內問題，實無爭持之必要，當前急需，爲

挽救危亡，求所以自贖而已』，均是誠摯的希望南京能夠早日回頭的言詞。所以王亮儔先生返國，從事和平協作運動後，粵方已再三懇切的表示：祇要南京政府有徹底改革其錯誤政策之決心，與根本接受「齊」「有」兩電及民國二十年和平會議所議定關於和平統一之成案，實踐前言，則一切問題均可迎刃而解。且在治標方面提出三事：

1 須即開放人民言論集會出版之自由；

2 須確定入川剿共，對西南各省，并不作大兵壓境之威脅；

3 對於此間之朋友同志，不得敵視暗殺，而猖獗殺人之組織，須即解散；

要求粵方實行，以為和平協作之事實證明。但不幸，甯方對於粵方和平協作的主張，和上列最低限度的要求，均不能有事實的答覆，所謂甯粵和平協作運動，到近日來也更形黯淡，已瀕於絕望之境了。

為什麼甯粵和平協作不能得到圓滿的成功？詳細研討的結果，我們認為是由下述各種原因的作梗。

第一：手握南京政府一切權力的軍閥蔣介石，他沒有徹底改革其錯誤政策的決心，與實現和平協作的誠意。換句話說，他還要繼續其叛黨賣國的路線，至死而不悟！

第二，南京政府本身便不能脫離帝國主義的支配。在目前，它顯然成爲日帝國主義在華的工具，和滿洲傀儡偽國祇有名義上的不同，而沒有實質的差別。因爲蔣介石他要幹反革命的勾當，和國內革命的勢力相對立，他自然要走上做日帝國主義在華工具之途。而且也必然的要和國內一切親日賣國賊的集團——政學系，安福系，和改組派——深相結納。

目前的蔣介石在政治上顯然成爲親日派的俘虜，一切內政外交的措置，均不能不聽命於這親日派的支配了。因爲不如此，他們便要借着其主人——日帝國主義——的勢力向蔣介石示威，蔣介石不能站在革命的反日帝國主義的前線，他能不低首就範於這羣親日賣國賊集團的操縱指揮麼？甯粵和平協作既以實現黨的主義，政綱，與政策爲中心，則這羣親日賣國賊便不能不首先打得他們一個落花流水！因此，他們要保護其主人在華的利益，和鞏固其私人的權勢，尤不得不拚命設法，從各方面去破壞甯粵的和平協作，用各種利誘威脅的手段去包圍阻碍蔣介石，使其不敢接受粵方和平協作的一切主張。譬如汪精衛不斷的散布謠言，不謂胡先生卽出洋，卽云胡先生若北上，予以職位相讓，來中傷胡先生，便是實例。又如，粵甯和平協作的空氣正現濃厚之際，黃郛便來京就內政部長的職，而日軍侵犯察東的警報也傳播世界了。關東軍送中國的聲明書，不再經過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及北平軍事分會，而由日本公使館武官鈴木中將在滬正式手交外次唐有壬，直接向國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正式抗議，更是表明其今後對華北一般情勢之意嚮，要南京政府直接負責交涉了（無恥的南京政府還說察東問題是地方事件），這不是向蔣介石示威嗎？至於親日派故意請鈴木到南京去親自教訓蔣介石一頓，使他識相，使蔣介石嚇得屁滾尿流，再也不敢提起和平協作這件事了。轟動一時的甯粵和平協作的運動，於是在這班黨蠹如改組派，政學系，安福系一羣親日賣國賊們所阻碍，所破壞下而失敗了。他們彈冠相慶，同聲歡呼：親日派萬歲！

第三，奔走和平協作運動者之認識不足。在這次奔走和平協作運動的人，他們愛護黨

國的精神，自然是值得世人欽佩的。可惜他們的認識未免有所不足。我們問：爲什麼需要甯粵和平協作？和平協作的目的何在？則其答案，無疑義的是：需要甯粵合作，共同負起挽救黨國危亡的大任；和平協作的目的，在於實現黨的主義，政綱，和政策。然而這次奔走和平協作運動者，顯然沒有把握這一問題的中心。他們祇斷斷於私人感情的調和，與私人意見的接近，而忽略於徹底改革黨政之企圖。誠如胡展堂先生所言：『惟人之感情，必須理之性支配，如徒重感情，喪失理性，不啻自滅良知。此種感情，實不值我人重視。余與汪蔣諸先生之私人感情，至今並無變動，今日所爭持者，爲國家民族之存亡問題，與主義政策之實行問題，決不能從以感情兩字掩蓋一切也。故今日而尙協商所謂和平，講求所謂合作，則先決問題，卽爲南京政府是否有澈底改革其錯誤政策之決心，與是否有接受我人主張之決心。』像這種的奔走和平，與甯粵協作，真是風馬牛不相及，怎樣能成功呢？等而下之者流，更視和平協作爲其私人政爭之工具，公然揭示排斥某某而以某某來代的卑劣主張，藉此以達到位置私人，擴充一系之權利爲目的。像這種的人，口頭上是熱心於和平協作，實際上乃是極其無恥的在無形中給和平協作以巨大的打擊，其罪惡更不堪問聞了。

以上三種原因，便是阻碍與破壞這次甯粵和平協作的動力。所以要實現甯粵和平協作，共挽黨國的危亡，便不能不掃除上述這些和平協作之梗！我再重複一次的說：和平協作是否成功，全在

1. 蔣介石有無誠意接受粵方關於和平協作的一切主張，與是否具有革命的決心，重新站在黨國的立場而奮鬥。

2、蔣介石有無勇氣抗日，立將環繞在他左右的，操縱，把持南京政府外交的親日賣國賊的集團——改組派，政學系，安福系等一脚踢開，使這些醜類漢奸無所用其技倆來蠱害黨國。

3. 奔走和平協作運動者應以實現黨的主義，政綱，與政策爲中心運動，不應斷斷於調和私人感情與意見爲目標，至於藉和平協作爲政爭工具之敗輩，更應立時肅清，不使其混入以謀破壞。

也許有人要問：爲什麼粵方不可以讓步呢？我們的答覆很簡單：那便是粵方關於和平協作的一切主張，均是挽救黨國的大計，代表全國民衆的迫切要求而提出的，並沒有私人的意見參加其中。譬如在治標方面所提出的三項要求（一）須即開放人民言論集會出版之自由；（二）……等等也可以遷就退讓麼？果如此，粵方也不會和南京形成對立，又何須乎甯粵和平協作呢？

至於認胡先生入京爲實現甯粵和平協作之先決問題者，更是無知得可笑了。大家都知道：胡先生是忘我的人，他一生的出處行止，均以黨的主義與國家的利害爲標的，此外，他無所求。所以胡先生最近很坦白的表示：『余之出處行止，無人能支配之，惟無時不受主義與良心之監督，如可告慰於良心，無愧於主義，則余之北上南行，均無問題。余生平不逆詐，不憶不信，當此國家多難之秋，惟望當局有澈底改革之實際，成功不必自我，除主義政策之外，余復何所爭持？然而未同而言，無徵不信，不可不慎，余之行事，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一心爲國，更無不可告人之隱。』由此，可見胡先生對於甯粵和平協作的態度，是怎樣的光明正大，爲黨爲國啊！

本社出版叢書之一

反蔣運動史

每册大洋壹元

是書完全站在護黨救國之立場，對於蔣中正叛黨禍國之罪行，及歷次反蔣運動之始末，均有詳實之敘述；而對於歷次反蔣運動之失敗，尤均指出其每次失敗之重因，並加以明確之分析與批判，使正義得伸於天下，奸邪不容於世人，且可作後事之借鑑。至於史料之豐富，文筆之流暢，尤其餘事，誠爲反蔣運動中空前之巨著也。全書四十餘萬言，凡七百餘頁。

本社出版叢書之三

中國軍閥制度研究

出版預告

吾人當前之最大任務，厥爲推翻軍閥統治，然軍閥制度究爲何物，此爲一切從事於護黨救國之革命同志所亟欲得解答者。本社特編著此書，以應同志之需求。故凡得此一卷，即可深切了解軍閥制度之罪惡，以增長其推翻軍閥之決心與勇氣，而對於正在實施軍閥制度之南京統治，尤當疾首痛心也。斯書已付印，不日即可出版，希閱者注意。

歡迎訂閱

「本社出版之

青年軍人

半月刊

零售每期三分

定閱全年大洋六角

本刊出版迄今，已有三載，對於總理遺教之闡明，三民主義之發揚，以及青年軍人之訓導，均有系統的敘述，尤其對於南京軍閥統治下之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等之設施，更有透澈的觀察，和正確的批評，不但爲指示目前政局之南針，更可爲推翻南京軍閥統治之先導。全國青年軍人，及革命羣衆如欲訂閱者，當特別優待，以答雅意。

定閱處：廣州市崔府街五十三號本社

介紹黨言社主編之

黨言

半月刊

零售每期三分

定閱全年大洋六角

胡先生在該刊發刊詞中寫道：『我們目前的任務在：（一）詳舉現實，洗刷國民所加於黨的主義政策的誤解，使人人認清甚麼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分野。（二）從主義與現實之認識，團結同志，摧破這污辱本黨，敗壞本黨的軍權統治，務使本黨主義與政策，能繼續爲切實之推行。這兩者，總言之，是一種清黨的運動。不但是清釐黨的理論——剔除一般人因軍閥之倒行逆施而加於黨的誤解，而且要肅清叛黨的份子，歸還黨的固有組織，和建黨的原始意義。』看了胡先生這幾句發刊詞，也就可以明白黨言的目的和任務了。該刊特請西南各黨政領袖胡展堂先生，邵海濱先生，蕭佛成先生，與劉蘆隱諸先生等擔任長期撰文，凡關心西南黨政各領袖言論的人，尤不可不訂閱。

國家圖書館



001707494



70.7
465:4

籍

00